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南史话/罗卫东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3
(甘肃史话丛书)
ISBN 978-7-80714-359-8

I.陇... II.罗... III.陇南市—地方史
IV.K29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255 号

陇南史话

主 编：	罗卫东	
责任编辑：	周乾隆	责任校对：周乾隆 周桂珍
装帧设计：	房 娴	设计助理：姬 欣

出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营 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0931) 8454870 兰州共赢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0931) 8512358

排 版：	甘肃地质印刷厂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地 址：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
邮 编：	730060

开 本：	79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80714-359-8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MULU



陇南览胜

陇上江南 / 3
古史述略 / 8
军事要地 / 10
百业俱兴 / 13



古代文明

灿烂的古文化 / 21
氏族的摇篮 / 25
秦人发祥地 / 35
悠悠千年史 / 39



沧桑古史

汉武辟置武都郡 / 49
三国鏖兵古战场 / 54
金戈铁马话仇池 / 60
诗圣杜甫陇南行 / 66
吴氏兄弟抗金兵 / 70
明清风云 / 74

硝烟滚滚说民国 / 81
红军足迹遍陇南 / 86



群星璀璨

愤世嫉俗的辞赋家赵壹 / 95
北魏大将杨大眼 / 97
北周名臣赵昺 / 98
西县智士赵芬 / 99
“八仙”之一张果老 / 100
“诤臣”吴郁 / 102
“诗窖”王仁裕 / 102
“世功保蜀”的吴挺 / 104
抗金名将丁焜 / 107
“紫大虫”张威 / 108
“教授”将军曹友闻 / 109
赤心报国的马暨 / 110
“断头将军”马瑋 / 111
“弓马绝世”按竺迳 / 112
“历事九朝”的蒙元重臣赵世延 / 114
直言无隐的门克新 / 116
“天下官吏楷模”高斗南 / 116
岷州廉吏张锦 / 117
文州贤臣何宗韩 / 117
阶州名儒邢澍 / 119
“桃李满天下”的任尚惠 / 121
修志专家吴鹏翔 / 121
为民请命的申庭顺 / 122
“公车上书”的黄居中 / 123
“自甘随玉碎”的程海寰 / 124
为宣传抗日而献身的苏河 / 126



风景名胜

西北第一洞万象洞 / 129
白龙江畔朝阳洞 / 130
仙阁琼楼红女祠 / 132

驰名川陕五凤山 / 132
风景如画锦屏山 / 133
奇峰耸翠鸡峰山 / 134
云锦霞漪裴公湖 / 135
幽洞仙迹金莲洞 / 136
仙洞流泉香水洞 / 137
洞天福地仇池山 / 137
碧波荡漾的文县天池 / 139
阴平古道多故事 / 140
文县碧口水库 / 142
文县素岭有奇花 / 143
康南胜景响水泉 / 143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 / 144
天然奇景梅子园 / 145
秀丽的白云山公园 / 146
森林公园大河坝 / 147
余音飘逸琵琶崖 / 148
流云缭绕云屏山 / 149



古迹文物

南宋古城米仓城 / 153
古柏森森广严院 / 153
武都城关清真寺 / 154
凤凰台下杜公祠 / 155
汉隶摩崖《西狭颂》 / 157
古朴雄浑吴挺碑 / 158
成县革命烈士陵园 / 159



西和城郊白雀寺 / 160
岷郡山萨真人祠 / 160
西和法镜寺石窟 / 161
八峰山上古石窟 / 162
珍贵的宋代铜棋 / 163
栏桥寺洼文化墓葬 / 163
诸葛军垒祁山堡 / 164
王仁裕神道碑和墓志铭 / 165
《王羲之族谱》与王羲之 / 166
大堡子山秦公墓 / 166
大元敕赐雍古氏家庙碑 / 169
稀世之宝秦公簠 / 170
钟楼上吴玠墓 / 171
徽县清真大寺 / 172
邠家庄白塔寺砖塔 / 173
《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 / 173
徽县大河店修路碑 / 174
文县萧籍墓 / 174
宕昌侯儿坝摩崖 / 175
康县古城白马关 / 175
三国胜迹邓邓桥 / 176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 177
张果老登真洞 / 178
寒潭秋月香泉寺 / 179
陇南影子腔清代手抄剧本 / 180



艺文荟萃

戏曲艺术 / 183
民俗风情 / 189



后记

陇南市位于甘肃



因其地处陇山以南而

名为南，南是四川南

陇南览胜

34° 38'，东经

104° 10' ~ 106° 33'

地理位置处于祖国大陆行政
的中心。

2004年1月，经国务院

准，陇南地区更名为陇南市

市现辖武都区、文县、成县

县、宕昌、西和、礼县、康县

徽县、两当县，市政府驻武都



陇上江南



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因其地处陇山以南而得名。东接陕西省，南连四川省，北邻天水市，西近定西地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介于北纬 $32^{\circ}38'$ ~ $34^{\circ}38'$ 、东经 $104^{\circ}10'$ ~ $106^{\circ}33'$ 之间，地理位置处于祖国大陆行政区划的中心。

200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陇南地区更名为陇南市，全市现辖武都区和文县、成县、康县、宕昌、西和、礼县、两当、徽县八个县，市委、市政府驻武都区城关。全市总面积2.79万平方公里，人口270多万。主要有汉、回、藏等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

陇南市地处西秦岭与岷山之间，位于青藏高原东侧边缘，是甘肃省唯一具有河谷亚热带气候及其生物资源的森林景观区。西部向青藏高原之一的甘南高原过渡，南部向华中

地区的四川盆地过渡，北部向华北地区的陇中黄土高原区过渡，东接陕西秦岭与汉中盆地。横亘境内的白龙江，是我国地理上南方和北方的天然分界线。境内高山、丘陵、河谷、盆地交错分布，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海拔一般在550米~4200米之间，最高处是文县西北的雄黄山（海拔4187米），最低处为文县东部的罐子沟（海拔550米），既有北国之雄奇，又有江南之秀丽，素有“陇上江南”之美誉。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曾说：“陇南是一个宝贝的复杂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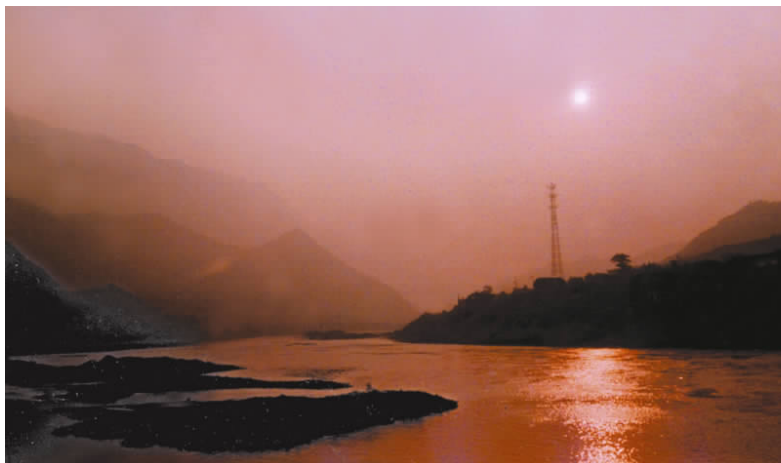
陇南处于北亚热带湿润、暖温带湿润、高原湿润等多种气候的过渡地带，年平均气温 9°C ~ 15°C ，年平均降雨400毫米~1000毫米，为全省之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160天~280天。日照充足，气候宜人。由于境内海拔高度相差悬殊，气候垂直变化较为明显，南北温差较大，故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



悠悠西汉水



陇南览胜



白龙江之晨

熟至三熟，除冬麦、水稻外，还可以生长多种亚热带经济作物，如柑橘、油桐、茶、桉树、棕榈等。徽、成盆地是陇南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带，地处成县、徽县和两当县三县中部地带，海拔700米~1300米，年平均温度 8°C ~ 12°C ，

同天”之说。

武都、康县、文县等河谷地区，海拔均低于1000米，是甘肃省惟一的亚热带气候区，属甘肃省高温区，年平均气温在 14°C 以上，气候温湿。农作物一年二

四季分明，降水量较多，是陇南稻、麦、棉、油、桑、蚕及木本油料的重要产区，也是全省冬季蔬菜基地。陇南有水稻、小麦、玉米、洋芋、黄豆等30多种粮食作物，有白菜、茄子、萝卜、蒜、辣椒等50多



大红袍花椒



油橄榄

种蔬菜,被誉为“甘肃的西双版纳”。

陇南的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境内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岷江流域的高山深谷地带,保存着成片的原始森林。全区林地总面积达1758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

38.8%,堪称我国西北内陆的绿色宝库。现已封山育林的白龙江林场,曾是西北木材供给的主要基地。全区有各类树种达1100多种,是全省树种最多而且最复杂的区域,有不少被列为国家级、省级



文县大熊猫



金丝猴

保护的珍稀树种,其中有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孑遗植物”,如银杏、水青树、红豆杉、铁杉、香樟、白皮松以及法国梧桐、油松、华山松、云杉、冷杉、桦、柏等优质乔木共50多种;有北亚热带植物,如柿子、柑橘、无花果、茶树、油桐、竹子、棕榈、楠木等;此外,还盛产暖温带林产品,如花椒、核桃、苹果、木耳、猕猴桃、生漆、板栗等。武都的樱桃、无花果、油橄榄、枇杷,文县的柑橘、茶叶,康县的核桃,徽县的银杏等闻名省内外,康县、武都区分别被列为全国核桃和油橄榄生产基地。陇南是甘肃惟一的茶叶产区,康县阳坝、文县李子坝、武都裕河等地的茶叶,清香浓郁,享誉省内外。现已查明,全市有食用价值的菌类就达200多种。在茂密的森林中,生栖着30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受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就有30多种,如大熊猫、金丝猴、羚牛、金猫、蓝马鸡、红腹锦鸡、水獭、大鲵



陇南览胜



嫁接杏、山楂、雪梨、灵芝

等。

陇南自古就有“千年药乡”之称。全市有各类中药材1200多种,其中名贵药材300多种,尤以武都的“米苍红芪”、文县的“纹党”、宕昌的“岷归”、礼县的“铨水大黄”驰名中外,荣获国家经贸部颁

发的“荣誉证书”。近年来,又试种成功了西洋参、天麻、山茱萸、黄连等50多种药材。陇南是全国主要药材生产基地之一。

独特的气候特征和自然环境,使这里月月花盛开,四季树常青,终年有鲜果,山山出珍奇,

因而有“陇上小江南”和“植物大观园”的美称。

陇南地下矿产资源丰富,藏量大,品位高,开发前景极其广阔。目前探明的金属矿和非金属矿有34种,矿床、矿点200多处。其中资源清、藏量大、品位

高且有较高开采价值的金属矿有铅、锌、锑、汞、铜、金六种;非金属矿有大理石、石灰岩、水晶、滑石、石膏五种;另外,还有储量较大的锰矿和小而富的铁矿。全市现有四大金属矿带:一是横亘区内北部西和县、成县、徽县三县,



碧口电站

绵延80多公里的西成铅锌矿带，铅锌金属贮量达1500万吨，远景贮量2000万吨，仅次于云南南坪铅锌矿，是全国第二大铅锌矿体；二是西和县、礼县、宕昌县的锑矿带，仅西和县崖湾锑矿，金属锑储量高达15万吨，属全国第

三大锑矿体；三是文县临江乡大坪村沟岭子锰矿带，金属锰储量达114.85万吨，远景储量133.05万吨，属全国第四大锰矿，该矿带还有钼金属储量762.42吨、钴金属储量953.27吨，品位很高，极具开采价值；四是文县、礼县、西和县、成县的黄金矿带，黄金储量在100吨以上，是川、陕、甘“金三角”的中心地带，年产黄金万两以上。已探明储量的大中型矿床有20多处。正在探查的文县阳山金矿，为全国罕见的特大型金矿。近年来，在礼县又发现了储量较



徽县嘉陵江大桥

大的岩金矿，文县境内的硅矿达1亿多吨，康县南部的阳坝、太平储藏着大量铜矿，开发前景诱人。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为陇南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全市水利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河流



白龙江



密布,有嘉陵江、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等大小河流3762条,均属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年径流总量279亿立方米,水力理论蕴藏量为425万千瓦,可开发量223万千瓦,占全省水力资源的1/3。因其冬不结冰,冬夏水量的峰谷值差值小,因此开发利用潜力极大。目前已建成及在建的大小水电站有200多座,装机近50万千瓦,仅占可开发量的20%。全市人均拥有水量3580立方米,比全省人均拥有水量多1倍,比全国人均拥有水量多880立方米,水利开发前景十分可观。在宝成铁路未修通之前,嘉陵江和白水江均通行木船,是甘、川两省商业往来的主要运道。

一带属古西垂地,秦始皇的祖先大骆、非子曾在这里养马,并且还是秦庄公、秦襄公、秦文公等几代君主的都邑所在地,直到秦文公四年(前762年),秦人都邑才由西垂迁往渭干之汇的新邑,但西垂仍是秦人的重要活动地区,因此,陇南是秦人的发祥地。

自秦汉至隋唐的一千多年间,秦陇渭河一带是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关中地区一直是各朝都邑所在地。陇南地近关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关陇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受到了巨大的辐射和推动作用。今陇南区域内最早的地方行政建置始于秦代。战国秦惠文王五年(前333年)秦灭蜀时,拓地千里,其地入秦,大约就在此时首置武都邑。秦始皇统一六国,行郡县制,陇南大部地区属陇西郡,并设县、道,见之于史料的有西县(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武都道(今西和县南部)、下辨道(今成县)、故道(今两当县、凤县一部)。“道”是氏、羌族集聚的地区。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首置武都郡,郡治武都道(即今西和县洛峪),辖九县,辖区相当于今陇南市白龙江以北大部分地区,自此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活动,陇南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氏族,今宕昌一带是羌族居住区。氏族长期生活在西汉水、嘉陵江、白龙江沿岸,与关陇地区联系密切,大量接受了汉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农耕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种植粟、麦、麻,畜养猪、牛、马等。到汉灵

古史述略



陇南开发较早,历史悠久。境内古代文化遗存遍布各地,西和县长道镇宁家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与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属同一时期。这表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了。

据文献记载,这里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故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宋代罗泌《路史·后记》载:“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纪。”仇夷,即仇夷山,今西和县南部的仇池山。

周、秦时期,有戎、氏、羌和秦人在这里活动。今礼县东北部、西和县北部

帝建宁四年(171年)李翥出任武都太守时,“年谷屡登,仓库唯亿,百姓有蓄,粟、麦(石)五钱”。同时,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矿产开采,据成县《耿勋碑》记载:武都太守耿勋“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钱,即铸造的货币;器,则是铸造的器物,如兵器、礼器等。礼县盐官的井盐生产也已开始。在商业贸易方面,开通了今徽县南至嘉陵江的水运航道和今成县经徽县至陕西略阳的陆路道路,为南北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西汉王褒《僮约》记载:“武都卖茶。”可证明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地处南北交界地带的陇南地区,战争迭起,烽烟不息。魏蜀相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氏杨割据的旗帜已高高竖起。这段时期,由于南北对峙,陇南地区处于中原王朝“失控”状态,氏族乘机扩张势力,陇南先后出现了仇池、武都、武兴、阴平和宕昌五个氏、羌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时间持续近三百年。由于同南北朝各国的频繁交往和大规模的人口内移外迁,陇南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了,氏族的文明水平已接近于中原的

汉族,首领封爵替代了部落酋长制,封建化进程加快了。宕昌一带的羌族同中原的关系也加强了,宕昌国王曾亲自到南梁进献甘草、当归等药材。

盛唐时期,陇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唐王朝在今成县、武都等地开荒屯田,大量种植小麦,并生产花椒、柑橘、核桃、棉、绸等,并且还作为特产上贡朝廷。道路修建也有了新的发展,开凿了今成县经西和、礼县到天水的道路。两宋时期,陇南屯田的规模更大,郑刚中“于阶、成二州营田,抵秦州界,凡三千余顷,岁收十八万斛”。吴玠在徽县、成县这一带大量屯田,“岁益屯田五十万斛”。以国家经营为主的茶马贸易十分兴旺,每年从西部少数民族购买的军马近万匹。在宋金交战时期,南宋每年从宕昌买马700匹,据现存《世功保蜀忠德碑》载:吴玠“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辛巳之战,西路骑兵甲天下”。因此,



两当县云屏风光

陇南是南宋军马的主要供应基地之一。

明清时期，陇南一带战乱较少，大量人口从陕西、四川迁入，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灌溉的阶段。水利建设空前发达。白龙江、西汉水、白水江等流域相继兴修水渠一百余条，灌溉土地数万亩。清乾隆年间，成县知县黄泳从南方引进水稻，并亲自撒种、插秧，予以推广。当归、党参、大黄也开始大面积种植，改变了原有粮、棉、麻等比较简单的种植结构。造纸、酿酒、织布、缫丝、榨油等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矿产开采种类增加，除原有铜、铁矿外，还增加了煤、石炭、铅、沙金等矿。交通运输，特别是水运空前发达，清初杨三辰任徽州知州，组织民工疏通嘉陵江水道，造船只，通水运。当时，嘉陵江上游运输官船共110艘，其中徽州造58艘，水师营造52艘。交通条件的改善及药材、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从而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专业化贸易中心，著名的有文县碧口的水陆码头、礼县盐官的骡马市场、宕昌哈达铺的药材市场、成县纸坊的麻纸市场等，都十分繁荣，产品行销西北、西南各地。

悠久的历史，秀丽的山川，为陇南孕育了一大批闻名遐迩的古迹名胜。礼县西北的祁山堡，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地，至今残垣仍存，古垒依旧；西和县南部的仇池山，三面临水，崖壁陡峭，是南北朝时期氐族政权仇池国的军事基地；成县东南凤凰山下的杜公祠，始建于北宋，是全国纪念“诗圣”

杜甫最早的祠堂之一；两当县的张果老洞、文县的阴平古道、宕昌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这些古迹表明，陇南市的人文景观十分丰富。除此之外，还有遍布全市各地的风景名胜，如武都县东南的万象洞，是西北规模最大的石灰岩溶洞，洞内万象森列，奇幻绚美，犹如仙境，堪与七星岩、芦笛岩媲美，早在两宋时期就成为游览胜地；文县北部的洋汤天池，碧波粼粼，清爽宜人，是罕见的高山湖泊；康县南部的阳坝梅子园，飞瀑流泉，奇花异草，人称“小九寨”；成县鸡峰山，奇峰峭立，瑰丽多姿；徽县的三滩，如锦似绣，神秘诱人。



军事要地

陇南地处陕、甘、川三省要冲，境内多高山大河，素有“秦陇锁钥”、“川蜀门户”之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相争之地。

早在周秦时期，秦人便在西犬丘（今礼县东北部）一带同西戎相互杀伐，历经数百年，始击败戎人，立国于此地。后由此东进，进据关中地区。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刘邦派曹参率兵出汉中，攻取下辨（今成县）、故道（今两当县、凤县）。同年，又派樊噲进攻西县于白水（西汉水上游，一说洛河）之北。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西南夷，降服白马氐族，于其地设置武都

郡,郡治武都道(今西和县洛峪),辖九县。此间,氏人多次反抗,均遭镇压,许多氏人还被迁往他地。东汉初年,刘秀进占天水,得陇望蜀,先后派吴汉、岑彭、来歙、盖延、马成、孔奋南进,与公孙述、隗嚣、隗茂在河池(今徽县)、下辨(今成县)一带交战数十年,最后终于“得蜀”。

三国时期,魏、蜀为控制陇南,前后交战近半个世纪,直到公元263年,魏五路伐蜀,邓艾沿白龙江南下,自阴平小道“偷渡”,行无人之地七百里,进占江油。蜀军无险可守,蜀后主刘禅只得开城投降。

东晋至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中原大乱,原迁往天水、关中一带的氏族纷纷返回故里,以仇池山为中心,相继建立起仇池、武都、武兴、阴平四个氏族地方政权,前后绵延达二百八十多年。作为处于南北两大势力之间的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存在如此之长的时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山高谷深,守易攻难。

宋金交战时期,陇南是南宋王朝的西北边防前沿地带,也是金人志在必得的

入蜀要道。南宋学者郭允蹈在其《蜀鉴》一书中再三告诫,“阶、成、兴、凤等州为蜀之藩篱”,保蜀必先保阶、成及汉中之地。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吴玠、吴玠、吴玠等在陇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这一带前后坚守六十多年,抗击了金兵元帅兀术、萨里干等数十万人的多次进攻,大小战役百余次,成功地守住了南宋王朝的西北防线,为川蜀人民及南宋王朝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生活和生产环境。

明清时期,尽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移至东南,但陇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大的社会动荡都波及陇南。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明军分两路伐蜀,一路由汤和率水师沿长江西进,一路由傅友德率步骑兵出秦、陇南下。朱元璋亲自对傅友德说:“若出其不意,直捣阶、文,门户即坠,腹心自



古战场祁山堡





“两当兵变”旧址

带起事的白朗起义军也曾转战到陇南，相继攻占徽、成、武都、宕昌等县，进抵岷县、临潭一带，后又退至陇南，从两当县出境。

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四支主力

溃。兵贵神速，患不勇耳。”傅友德引兵出陈仓（今陕西宝鸡），攀缘岩谷，昼夜行军，相继攻破阶州、文州、绵州。当时嘉陵江涨水不得渡，遂削木为牌数千，书攻克阶、文、绵消息，投入江中，顺流而下，下游蜀守军见之皆解体。明中叶时，四川农民起义军兰廷瑞北上，在攻破徽县、成县后退回四川。崇祯年间，李自成率部或出蜀，或入蜀，数次经过陇南，前后达五年之久。此后，张献忠部也多次北上攻占徽县等地。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军进至陇南，往来于阶州。赖文光、梁成富等先后数次由汉中、关中进入陇南，攻占两当、徽县、成县、阶州，并在阶州城（今武都区城关）据守半年之久。最后，在清兵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蓝大顺战死，梁成富被俘后遇害。陕西回民大起义时，礼县、徽县、两当、武都等地都是起义军征战回旋之地。辛亥革命期间，在河南宝丰、鲁山一

长征部队都先后途经陇南，足迹遍及全市九个县一百多个村镇。习仲勋等人在两当县发动兵变。党中央在宕昌县哈达铺作出了会师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红四方面军曾计划占据陇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陇南发动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建立了以岷、宕昌、成、徽、两当、康苏维埃政权为核心的临时革命根据地，陇南人民为红军筹集了数十万斤军粮和大量军需物资，使经过雪山草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数万名红军在此得以休整，数千名陇南儿女参加了红军。陇南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在解放战争中，陇南地下党领导人民群众展开敌后游击战，策动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在解放军经过陇南南下解放大西南时，陇南人民积极开展支前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百业俱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2月中旬，陇南全境获得解放。从此，陇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覆灭，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陇南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

五十多年来，地委、行署领导全市人民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农业经济迈大步 20世纪50年代初，全区广泛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兴修水利，与河争地，推广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到1955年，全区累计修建梯田2.3万亩，水渠520条，可灌地3.7万亩，为振兴陇南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开展了大规模的改土造田和水利建设活

动，陇南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地、县各级政府也在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陇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1977年，地委提出了“粮食和多种经营并重”的方针；1983年深化为“种草种树，振兴林牧，多种经营，勤劳致富”。明确提出：多种经营是陇南的优势，也是振兴经济的基础和关键，山区二百多万农民固守在有限的耕地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才能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按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要求，大力推进四个商品基地建设。到2000年底，“四个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以徽成盆地为主的“三县三片”小商品粮基地，年提供商



陇南地区兴修水利现场





康县阳坝茶园

经济发展思路，即以西成小区开发带动全市工业和流通的发展，以“两江一水”（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流域50万亩水浇地建设带动全区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重点突破，整体推动陇南经济发展。明确提出，以“两江一水”流

品粮达7000多万斤，占全市商品粮总量的90%以上；以花椒、核桃、木耳、茶叶、油橄榄、银杏、苹果等几个重点产品为主的经济林基地，现已发展到200多万亩，水果产量近6万吨，茶叶250多吨；以猪、牛、山羊板皮、黑紫羔羊、蜜蜂为主的畜牧业基地，大牲畜存栏数达60多万头；以红芪、纹党、当归、大黄、杜仲等八大药材品种为主的中药材基地，已发展到15万亩。此后，随着对陇南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地委、行署又提出了“双带整推，重点突破”的

域50万亩水浇地建设为突破口，通过兴修水利、改土造田和小流域治理工程改变农业基本条件，带动全区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和扶贫开发、区域经济开发，并为工业发展提供可靠的原料基地。近年来，地委、行署把解决“三农”问题作



武都滨江公园



康县平洛龙凤桥

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打绿色牌,走特色路,努力创建以特色产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工作思路,农业特色产业基地规模不断扩大。龙头企业和市场建设步伐加快,产业化经营的层次逐步提高,扶贫攻坚取得了新的成效。

工业生产拓富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陇南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手工作坊和小规模的矿山开采,从业人数也不多。1949年后,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全区各县都相继建立了一批规模不等的工业企业、加工业和矿山开采业,如

文县碧口水电站、成县红川酒厂、徽县丝绸厂、两当县陶瓷厂、康县阳坝铜矿、徽县陇南春酒厂等。1979年,地委、行署确定了以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为突破口、以县办重点企业为骨干、全面推进工业企业发展的方针,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兴办县、乡集体企业的高潮,一大批以小型加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1985年4月,陇南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种草种树,振兴农牧,多种经营,以工致富”的经济发展方针。同年10月,胡耀邦同志视察陇南时题词予以肯定。以后,随着



徽县青泥岭“远通吴楚”碑



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对地情及经济发展优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各县立足于开发地上、地下资源,扩大横向联合,大力引进人才,使陇南工业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帮助下,地区东北部、西北部和南部三个区域开发以及碧口、黄渚、六巷三个工业小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有色金属、黑色金属、水电能源、建筑建材、医药化工和农副产品加工六大主导产业。其中,冶金、水电、白酒、农副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左右全区工业经济形势的“四大”支柱产业。1992年以来,陇南地委、行署继续坚持兴工富区的指导思想,立足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政策为导向,以矿业、电力和农副产品加工为龙头,以西成、碧口小区为突破口,大、中、小结合,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内涵挖潜与外延发展并举,全区工业和乡镇企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这几年来,地委、行署坚持以西部大开发总揽工作全局,坚持小康建设与扶贫开发“两手抓”的方针,扎实推进“六大战略”(非均衡发展、特色立区、工业强区、民营富区、科教兴区和追赶式发展战略),坚持“一路四化(公路建设的工业化、产业化、生态化、城镇化)建设”,坚持调整结构,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发展环境,加快国企改革,不断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速度、效益、质量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千年蜀道变通途 陇南地处西秦岭,境内多高山峻岭,深谷大河,地势起伏剧烈,可谓“举头峻峭嵯峨,侧耳波涛汹涌”。行路难,成为这一地区的历史难题。陇南先民们为冲出群山重围,刀砍斧凿,子孙相继,终于开通了几条出陇入川的古道,如汉高祖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时所途经的古道、三国魏将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时所走的阴平道、唐杜甫入蜀时途经的青泥路、北宋修建的白水路等,都成为古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古道虽然对沟通南北,促进陇南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施工技术,这些道路都十分狭窄、简陋、险峻。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就真实地描述了蜀道险峻难行的状况,诗中有“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之说。青泥岭,在今徽县东南,是古代由陇入蜀必经之地,这里重峦叠嶂,山势高峻,路如羊肠,千回百转。唐肃宗乾元年间,杜甫由同谷入川时曾经经过这里,写下了“白马为铁骊,小儿为老翁”的诗句。阴平古道更为艰险,邓艾以毡自裹,从摩天岭上“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岩,鱼贯而进。这种艰险异常的交通状况持续了数千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甘川公路仅修到武都,通过境内的华双公路质量也十分低劣,路况很差,行车常常抛锚。1949年后,各级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这里的交通建设,掀起了筑路高潮。1954年,修通了礼县通往天水的公路;1956年,相继修通了武都至康县、武都至文县、望子关至毛坝、西和通祁山堡的四条公路,

很快实现了“县县通公路”。五十多年来，在国家的大力资助下，陇南人民艰苦奋斗，共新修和改造干线及县乡公路近140条，总里程达4100多公里，98%的乡镇和70%的行政村通了汽车，初步形成了以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



宕昌岷江上的伸臂式木梁桥

网。蜀道难，最难的是渡河。以前，除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岷江等大河渡口要道上有为数不多的渡船、木筏以及一些伸臂式桥梁外，其余数百条江河上过渡全靠原始简陋的溜索，不知有多少个过渡者丧身于峡谷激流中。为此，各级人民政府花大力气修筑桥梁，共建成大、中、小公路桥梁510多座。最堪称奇观的是遍布境内大小河之上的铁索桥，共有200多座，在西北地区首屈一指。文县关头坝吊桥，桥长213米，跨度达180米，可供20吨重型汽车双向行

驶，成为连接甘陕川三省、造福乡民的“致富桥”。这些铁索桥不但基本上解决了沿河2000多个自然村120多万人“过河难”的问题，而且为开发和利用河流沿岸丰富的资源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宝成铁路从两当县、徽县境内通过，



武都城区街道





武都新城一角

信函、汇兑检查等业务全部实现了计算机操作，城市邮政营业窗口全部实现了电子化，邮政业务全面发展。

在文教卫生方面，全区已有各级各类学校3900多所，在校学生近40万人，其中大专院校3所，中专5所，教

师进修学校9所。全区有卫生机构360多个，从业人员6000多人。各种科研机构13所。九个县的有线电视全部开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科学研究等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此外，在城镇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来，围绕“撤地建市”目标，各县都制定完善了县城改造和重点集镇建设规划，各县县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政策为陇南大地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山川秀丽、资源丰富的陇南将以新的姿态、新的步伐，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全面小康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甘川公路直通四川省昭化，武都经洛塘到四川青川县姚渡也已通车，总投资近3.6亿元的江武公路改建工程已全线竣工。公路、水路运输业繁荣，已拥有民用汽车8000多辆，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相辅相成，基本实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蜀道难”一去不复返了。

各项事业大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各项事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邮电通讯方面，现已形成了以“三环一链”光缆网为主、微波网为辅的传输格局，全市各乡镇均实现了自动化和数字化，可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求。建成了全国范围内通存通兑的邮政金融计算机网，报刊发行、集邮、邮运路单、商业

古代文明

陇南气候温和、

西部、南部多高山峻



存的良好自然条件。

在武都区龙家沟发现的

森林古猿『化石证明，早在

多万年前，陇南就是古人类

的重要地区。

陇南气候温和、湿润，

西部、南部多高山峻岭，

深，林木葱郁；东部、北部

麦平川，可产小麦、水稻、



古 文 化 的 灿 烂



陇南气候温和、湿润,境内西部、南部多高山峻岭,坡陡谷深,林木葱郁;东部、北部多丘陵平川,河流纵横,水草茂盛,形成古代动物活动和人类劳作生存的良好自然条件。

在武都县龙家沟发现的“武都森林古猿”化石证明,早在一千多万年前,陇南就是古猿生活过的重要地区。

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在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流域的河岸溪谷边发现了愈来愈多的原始人类遗迹。这些丰富的古文化遗迹表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陇南的先民们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文物普查结果表明,陇南境内远古文化遗存相当丰富。新石器时代,主要



新石器时期的石斧



仰韶文化权杖头(彩陶)

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类型和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秦汉时期,陇南地区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所以秦汉文化遗存分布极广,几乎遍布全区各地。

仰韶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西汉水上游的西和县、礼县和北峪河流域的武都区安化、柏林、马街一带,大多属庙底沟类型。比较典型的有位于西和县长道镇的宁家庄遗址、礼县石桥乡高寺头遗址、武都区马街乡寺背坪遗址等。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寺洼文化遗存。学者们普遍认为寺洼文化是氐、羌民族的原始文化。

宁家庄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陇南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证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陇南先民们就在西汉水上游一带生息繁衍了。宁家庄遗址位于西汉水之南,南距西和县城二十余公里,面积约六万平方米。这里地势开阔,依山傍水,土质肥沃,气候温和,是陇南先民最早的开发居住区之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陶片以及古代人类



遗留下来的房址、窑址和灰坑,这些大多属于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范畴。其中最早的遗存是一种时代特征鲜明的交叉绳纹陶片,它与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特征完全一致,陶质较仰韶陶片疏松,火候不高,陶色不纯,内黑外红,陶片分层,这是因制陶技术较为原始所致。陶片口沿部有的呈锯齿状,这是早期陶器的典型特征。上述特征表明,宁家庄的早期文化遗存同大地湾的早期文化遗存时代大体相当。大地湾早期文化遗存时代经放射性元素¹⁴C测定,距今已有七千多年,据此可以证明宁家庄遗址的上限最早可达七千多年前。

宁家庄遗址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这类遗存在甘肃仅发现三处,除宁家庄外,还有秦安的大地湾和天水的赵村。

高寺头遗址位于礼县石桥乡高寺头村,属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类型。该遗址东西宽约150米,南北长约200米,发现有灰层、灰坑、灶址、房址等。地表遗留有大量夹砂、泥质及细泥质的灰、红、橙、黄色陶片。纹饰有细绳纹、彩绘等。器形有尖底瓶、卷沿盆、碗等。并发现石刀、石斧、陶纺轮、骨锥、骨鱼钩等生产工具,内涵十分丰富,保存较好,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高寺头出土的文物中,尤为珍贵的是一件女性头部塑像。塑像为陶质,色泽橙黄,现残存部分高为12.5厘米,宽8.5厘米,五官部分用堆塑与锥镂相结合的手法雕塑而成,双目深沉,嘴唇微启,头戴一串珠状装饰物,双耳有耳

环洞孔,十分美丽生动,是原始社会遗存下来的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珍品。据专家考证,这件塑像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盛时期的一位部落少女的形象,对于研究人类的文化艺术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汤池在《黄河流域的原始彩陶文化》中写道:“极为洗炼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生动地塑造了母系氏族社会一位可爱的少女头像,堪称我国原始雕塑的优秀代表作。”该塑像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并被列入《中国美术辞典》。

在北峪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寺背坪遗址较为典型。

寺背坪遗址位于武都区马街乡寺背村,地处北峪河北岸高出河床约10米的



礼县高寺头出土的陶质人头像

黄土台地上,遗址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文化层距地表1米左右,厚2米~3米,遗迹有连片灰层和灰坑,并有多层面积较大的房基地面,采集到的陶片以彩陶、泥质红陶居多,另有一些石器、兽骨和骨器等。彩陶有饰宽带纹的钵口沿,饰钩叶圆点纹的盒、钵、罐残片,饰网纹的罐残片。泥质红陶有饰线纹、交叉线纹的尖底瓶口沿,直口圆底钵残部及饰粗绳纹的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的罐口沿、底。此外,还有一些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器物的残片,数量少于彩陶和红陶。石器有打制的缺口石刀,磨制的石斧、石锛;骨器有骨锥等。从其文化遗存来看,该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致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过渡阶段,时间在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之间,距今五六千年。

位于马街乡大李家村的安坪、庙儿坪遗址,地处北峪河南岸。该遗址高出河床20多米,东西长850米,南北宽350米。文化层浅处已暴露于地面,深处距地表6米左右,文化堆积层一般厚达2米,最厚达4米,有连片的灰层和较多的窑穴、灰坑,内含大量的陶片,其中以彩陶片居多,并有少量石器、骨器和兽骨等。从文化层断层和内含物的特点看,灰层下部遗物属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上层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可判定这是一处较大的氏族公社聚落遗址。从地面采集到的陶片来看,多为彩陶片,次为泥质红陶片,夹砂黑陶最少。彩陶全为红陶黑彩,纹饰有宽带纹、

叶状纹的敛口钵片,有饰密集条纹、漩涡纹、网纹的盆、罐、壶片,还有残灰陶环和泥质灰陶的盆、罐口沿残片。

文物工作者还在附近村庄的农民手中征集到一件完整的四周饰满漩涡纹的五孔彩陶罐,色彩艳丽,器形十分优美。还采集到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锥,骨器有骨斧、骨锥等。

庙底沟文化遗存,特别是遍布白龙江、西汉水、北峪河、白水江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遗存的发现,表明陇南的古代先民此时已进入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晚期阶段。

在境内目前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存中,数量最多的是寺洼文化遗存,几乎遍布全市各地。武都区柏林乡冯家崖发现的任家坪墓群,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特征比较典型的寺洼文化安国类型文化遗存。

任家坪墓群位于北峪河南的黄土台地上,墓群均为土坑竖穴式墓,无封土。墓葬分布密集,间隔一般在2米~3米,数量很多,大部分保存完整。出土器物大多为口沿前后两侧均呈马鞍形的泥质手制灰褐双耳罐和灰褐陶壶、单耳罐、高足豆、低裆矮足鬲。另外,还发现少量的带细砂、谷壳掺和料的灰陶小瓮,并出土一件红彩三系的紫褐陶罐。任家坪墓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陇南寺洼文化遗存除任家坪墓群外,还有安化镇司家坝上坪遗址、白龙江沿岸的宕昌县沙湾高崖坪墓群、武都区两水镇后村东坪遗址、白水江沿岸的文县尚德乡王家坪遗址、上丹乡天头坪



遗址、横丹乡横丹村大坪上遗址以及西汉水沿岸的礼县陈家坪遗址等。学者们根据古籍中记载的氐、羌民族起源、活动区域及发展情况判断,寺洼文化极有可能是氐、羌民族的早期文化。寺洼文化的分布区域大致就是早期氐、羌民族的活动区域。

寺洼文化分典型寺洼文化和安国类型两类。典型寺洼文化的时代上限要早于西周,从其墓葬情况看,贫富悬殊,并出现了殉人墓,说明其社会性质已发展到了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社会末期,进入了奴隶社会。安国类型时代要稍迟于典型寺洼文化时代,大致与西周属同一时代(前1100年—前771年),距今约三千年。典型寺洼文化和安国类型是先后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分布在陇山东西两面,以洮河流域为中心区;后者主要分布在白龙江、西汉水、白水江一带。寺洼文化是甘肃、青海地区特有的土著文化,因最初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山,故以此命名。其陶器的主要特征为马鞍形双耳罐,并有少量的青铜器。寺洼文化遍布陇南,说明在西周时

期陇南已居住着为数众多的氐、羌民族,并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从其遗址和墓葬分布情况看,这些氐、羌民族还不断向北、向南迁移,一部分迁移到今陕西凤县、甘肃两当一带,继而循嘉陵江谷道北进至宝鸡及渭水南岸的清姜、益门、竹园沟、茹家庄一带,并和周人发生了密切关系。

据考古学家分析,陕西竹园沟等墓葬以及甘肃平凉市安国镇、庆城县石桥遗址和墓葬,均属寺洼文化安国类型。而在四川省岷江流域的成都、广汉、新繁、彭县一带发现的早期蜀人文化中,



左上：双耳红陶器（齐家文化） 右上：马鞍形双耳罐（寺洼文化）
左下：彩陶（马家窑文化） 右下：双耳四钉陶瓮（齐家文化）

出土的陶质尖底罐、呈柳叶形的青铜剑等典型代表性的器物,与竹园沟、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短剑、尖底罐基本相同,证明二者在文化上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判断,早期蜀国文化遗存就是白龙江、白水江上游及岷江上游一带氐、羌族南移的结果。今四川省成都平原及云南北部都曾经是古代氐族活动区域,这一点也为史籍记载所证实。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自崑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大约到西周中期以后,北上进入宝鸡、陇东一带的氐、羌文化被先进的周文化所融合,南下进入蜀地的氐、羌文化也逐渐消失了原有特征,被当地文化所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而留居在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嘉陵江一带的氐、羌民族,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但仍保留了原氐、羌文化的基本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氐、羌文化,其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平虽然大大低于中原地区,但明显高于岷江上游、白龙

江上游及河、湟一带的羌民族。大约到了秦汉时期,氐族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逐鹿中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氐族的摇篮

氐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在两汉及南北朝时期特别活跃,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前秦、后凉两个氐人统治政权,又在今甘、陕、川交界的陇南、汉中、广元一带建立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地方割据政权。隋唐以后,吐蕃兴起,氐人居住地区处于唐、蕃争战的中间地带,氐人或被同化、或与其他民族杂居、或退避于深谷大山



废弃的磨坊



之中,逐渐退出了历史政治舞台。

在古代,氏族由于僻居西垂,与中原各族鲜有往来,因此在先秦史籍中记载甚少,今天能够见到的也只得有一些零星资料。由于资料极少,因而在研究中,诸如氏族源流、形成时间、分布区域等问题,解者歧见甚多,令人莫衷一是。

关于氏族的起源,相传其先祖为有扈氏,与夏同姓。《尚书·甘誓》云:“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这个古战场现位于陕西省户县郊外。有扈氏被华夏打败,乃率众西迁,居于岷、汉一带的深山峡谷之中。这是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从现存资料看,商代卜辞中虽有“氏”字,但不作族称,而是作动词用,兼有征伐、调用之意,卜辞中常有“氏众”,意即“用众”。记载明确的是《诗经·商颂·玄鸟》,其中有“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郑玄注释:“氏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世见曰王。”孔颖达疏曰:“氏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今本竹书纪年》也载,“成汤十九年,氏羌来贡”,“武丁三十四年,氏羌来宾”。《山海经·海内经》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

先龙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逸周书·王会篇》载:“氏羌以鸾鸟。”孔晁说:“氏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氏羌,今谓之氏也。”这些最早记载氏族的史籍将氏羌并举,对此,后世学者有的解释为氏、羌属并列关系,是两个民族;有的认为氏是羌族的一支,因羌人种类繁多,故称“氏羌”,另有若羌、钟羌、发羌等;有的则认为“氏羌”是居住在氏地的羌人,氏人古已有之。

在先秦史籍中,也有将氏作为单一族名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恧,灵恧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郝懿行的《山海经注笺疏》解释说:“互人,即《海内南经》氏人国也。”“氏”、“互”二字盖以形近而伪,以俗“氏”正作“互”字也。据此,氏人应为炎帝后裔,炎帝为姜



岷山

姓,氏与羌均自认出于炎帝。据《周书·异域传》云:“氏人酋帅多姓姜。”可知《山海经》中虽多为神话资料,但确也保存着零星的可靠史实。《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氏羌,呼唐离水之西。”高诱注曰:“氏与羌二种夷民。”认为氏族是不同于羌族的另一个民族。

根据上述古籍所载,综合各家观点,可以看出,早在商朝时期,氏族就已存在,并且与商王朝有纳贡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在周武王伐商时,帮助武王的各氏族部落中,有羌而无氏,并据此来否认当时氏族的存在。实际上,在武王伐商时,并不是所有的氏族部落都起兵响应,有些甚至是殷商的盟军,氏人同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史籍中所载的氏羌“来享”、“来贡”、“来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氏人不参加周人的联盟也在情理之中。

氏族在族源上与羌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大都认为二者同源而异流,其主要根据是氏与羌都属姜姓,出于炎帝,属同一源流,其后则分属不同的族系。羌人主要居住于今青海河湟谷地的高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而氏人则长期生活于今四川西部的岷江流域及陇南白水江、白龙江、西汉水流域的深山峡谷地带,主要从事狩猎及农耕生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羌人。在先秦史籍中,之所以忽而氏、羌并提,忽而又氏、羌分提,主要是这些古籍作者对世居西垂偏僻之地的氏、羌民族了解不够,故而往往将二者视为同一民族。这种情况,在先秦古籍中并不鲜见,如把

东方各民族统称为东夷,把南方各民族统称为南蛮,把北方各民族统称为北狄,把西方各民族统称为西戎,等等。

氏人之所以称“氏”,史学界说法不一。四川学者任乃强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因其所居住之地位于河谷川坝的低地,故名。有的则认为“氏”古字通“氏”,根据许慎《说文》第十三篇“氏”字解:“巴蜀名山岸胁之堆簪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因此,“氏”就是居住在河岸峡谷崖壁下的居民,“顶上危石突出,其下可以居人之地。”(见张建昌《氏族的兴衰及其活动



宕昌官鹅沟风光



范围》)还有人认为“氐”就是“氏”,是一种悬虚不着地的棚阁,类似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山楼,引申为民族,即为“氏”族(见谭继和《氏、氐与巢居文化》)。

氐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对这个问题记载最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僬、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僬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对于这段记述汉代氐族活动范围的史料,从古至今都有不同的理解和释义,差异甚大。一种认为西南夷,即今云贵西北、四川西北及甘肃南部皆为氐族;另一种认为只限于冉駹东北的一些地区,即今陇南及四川西北一隅。冉駹,即今四川松潘、九寨沟县一带。尽管说法不一,但今陇南地区为氐族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一点,古今史家都是一致认同的,未有任何不同意见。

汉晋南北朝时期,氐族由于受到周边秦汉及巴蜀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影响,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有了较快速度的发展,并逐渐向北、向东发展,中原地区同其接触也日益密

切。这一点,在当时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翔实的记载。氐族种类繁多,而以居住在今陇南地区的白马族势力最为强大。“白马”,可能是这支氐人的“图腾”,也可能是其部落的名称,因其最靠近中原地区,故其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也要高于其他氐族部落,其势力也要较其他氐族部落强大。《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魏书·氐传》载:“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我君长,而世一朝见……世居此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应邵《风俗通义》中说:“氐人抵冒贪食,至死好利,乐居山溪,本西南夷之别种,号曰白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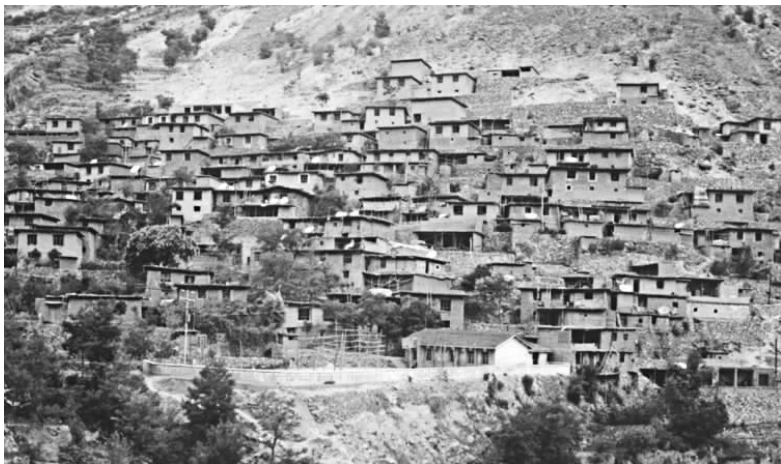
对氐人的生产、生活、风俗情况记载最为详细的是《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蝼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盖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獯道者

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

从现有史料看，在汉武帝以前，白马氏人的活动中心就在今陇南地区，北不超过渭水。《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氐道，“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氐道在今甘肃礼县北部、武山县东南部。东至嘉陵江沿岸，南至四川平武、青川，西至松潘、宕昌一带，为白马氏中心区域。汉武帝初年，开始拓展疆域，用兵西南夷，白马氏同西汉王朝发生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另一部分则被徙至他乡。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史记·孝武本纪》）。这是史书中第一次关于氐人被大规模迁往外地的明确记载。这次迁徙的时间是在武都置郡后的第三年，被徙人数很多，除徙往酒泉郡外，一部分还徙至今清水、秦安、陕西陇县一带。《魏略·西戎传》记载得十分明确：“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汧，即汧河，今写做千河，在陕西西北部，源出六盘山麓，东南流经陇县、千阳县，至宝鸡汇入渭

河。陇，即今陇山，古称陇坻、陇坂。这部分白马氏人在当地定居下来，经过二三百年的生息发展，到汉晋时已形成一定的势力，出现了临渭（今天水市麦积区东）氐苻氏、略阳（今秦安县）氐吕氏、清水（今清水县）氐杨氏等豪族，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汉武帝以后，武都氐人被迁外地的记载就不绝于书。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亲征隗嚣于上邦，于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年）冬派马成攻取武都，氐豪率数十万户逃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投降。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马超在兴国氐王阿贵和百顷氐王千万的支持下，叛汉，占据陇右，后在杨阜等联军攻击下，败退武都，与千万率众氐转奔入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春，曹操攻汉中失败，为防备蜀汉招募武都汧阳氐民充军，令雍州刺史张既迁徙武都氐人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即今陕西



岷江边上的古羌寨



关中及甘肃天水一带。不久,刘备遣军逼下辨(今成县),曹操以武都孤远,令武都太守杨阜迁武都氐、氏等族居民万余户出居京兆(今西安市西北)、汧(今陕西陇县东南)、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天水、南安(今陇西县东南)、广渭(今天水县东北)等郡县。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七月,在曹魏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武都氐王杨仆率众内附,被安置在汉阳郡(由天水郡改)。

在武都氐人被大量迁至甘肃河西、天水,陕西关中地区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氐人也被迁往蜀汉辖地汉中、成都一带。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因马谡失守街亭,诸葛亮被迫回军,途经西县(今西和县长道、礼县之间)时,“迁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建兴十四年(236年),蜀汉派人与武都氐王苻健联系,准备将其部落南迁广都(今成都东南),但苻健之弟苻双不从,自将四百户入魏。苻健则率其剩余部众迁居广都。

这些被迁至天水、关中的氏族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北方一支十分活跃的政治力量。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州氐人齐万年在关中氐、羌民众的支持下起兵反晋,共有起义军数十万人,称帝并建立了政权,接着围攻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接连打败晋军。次年,率兵七万屯于梁山(今陕西乾县),大败西晋名将周处,直到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才被镇压,齐万年被俘遇害。余众在巴氏李特率领下继续进行战斗。

齐万年起义,使西晋统治者十分惊

恐,太子洗马江统看到入关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势力的发展壮大将对西晋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特撰写《徙戎论》,要求将氐、羌等族迁回原地。他说:“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而此时的西晋朝廷自顾不暇,对此也无能为力,因而江统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之后,这些氐、羌民族不但没有回返,反而更向东发展了。据《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成帝咸和八年”条款记载,石季龙“徙秦雍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苻)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使居枋头”。枋头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在这支东进大军中崛起了两支力量,一个是苻氏,另一个是吕氏。他们先后立国建号,称雄一方,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苻氏原姓蒲,后氏豪蒲洪占讖文有“草付者应为王”之句,遂改姓为“苻”,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苻洪死后,其第三子苻健嗣位,不久,便率众西入长安。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建国,国号秦,史称前秦。苻健在位四年后卒,其子苻生立,然其凶残无道,在位两年后为其堂兄苻坚所杀。苻坚即位后,大量重用汉人治国,大力改善政治,强化中央集权,并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广立学校,兴办教育,很快使前秦出现了“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的兴盛局面。前秦建

元六年(371年),前秦灭掉割据关东的前燕,完成了对中原的占领。接着又用兵陇右、河西,克仇池,灭前梁,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随后又拉开了对东晋的战争。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前秦动员军队近百万南下攻晋,“淝水一战”,因轻敌被东晋击败,苻坚身中流矢,单骑逃回,不久被其部将羌族酋长姚萇所杀,国势大衰。苻坚死后,太子苻宏逃奔仇池,后辗转投奔东晋。苻坚族孙苻登在枹罕氏豪的拥戴下,自任督陇右诸国事、雍河二州牧,攻取南安后称帝。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年),苻登被姚萇之子姚兴所杀,其子苻丕逃至湟中(今青海湟中)称尊号,不久被乞伏乾归逐杀。另一子苻崇逃至仇池杨定(苻坚女婿)处,与杨定联兵攻西秦,初战得胜,后西秦以弱兵诱敌之计败杨定军,杀死杨定,前秦国亡。前秦共历六世,44年。

苻坚死后,氏豪吕光又建立了后凉。吕光的父亲吕婆楼曾助苻坚攻杀苻生,故而颇得苻坚信任。吕光初任美阳县令,后因战功拜骁骑将军。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奉苻坚命率兵七万讨西域,攻取龟兹。西域三十六国降服,遂东还至玉门关,占据河西,

自称凉州刺史、护羌校尉。386年,吕光闻知苻坚被杀,于是大赦境内,建元太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建立割据政权。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年),自称“三河王”,置百官,年号“麟嘉”,正式建立凉国,史称后凉。吕光在统治河西期间,忽视了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只依靠手下以氏族为骨干的七万多军队东征西讨,凭借武力杀戮来维持统治。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吕光病死姑臧(今武威),嫡子吕绍即位,但在位仅仅五天,就被其庶兄吕纂推翻了。吕纂即位三年又被其堂弟吕隆、吕超所杀。吕隆即位,“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弄得财力衰竭,众叛亲离,后凉内外交困,不得不向后秦投降。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后凉亡,吕隆率氏民一万余户东迁长安,不久为姚兴所杀。后凉共历四世,15年。

早在苻氏、吕氏崛起之前,徙至清



西和仇池山伏羲崖



水的氏豪杨茂搜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因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据有武都之地。杨茂搜的兴起要比苻氏、吕氏的兴起早三四十一年。紧接着,随着齐万年起义的失败,大批略阳、天水氏人南迁,《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略阳、天水六郡有郡民及氏人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年荒,就谷入汉川,敕关禁之,而户曹李苾开关放入蜀,散布梁州及三蜀界。”这部分南迁的氏人有相当一部分逃奔仇池,加之“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杨茂搜势

力遂大增。311年,杨茂搜得上禄(今西和县南、成县北),置骆谷城,称臣于成汉李氏政权,该割据政权传五代八主,历75年,至杨纂时为前秦攻灭,史称前仇池国。苻坚死后,其女婿——仇池氏豪杨定返回陇右,徙治历城(今西和县西峪坪),置仓廩于仇池山,令其堂兄杨盛守护。杨定招集流亡氏人近万家,自号龙骧将军、严平校尉、仇池公,称藩于晋。杨定死后,杨盛继位,至443年为南朝刘宋所灭,共传二代四主,历59年,史称后仇池国。后仇池国灭亡后的第三年,族人杨文德又于葭芦(今武都区外纳乡)建武都国,至477年杨文度时为北魏所灭,传二代四主,历30年。随后,刘宋政权又扶持杨文弘在武兴(今陕西略阳县)建国,史称武兴国,传四代四主,历81年。就在刘宋扶持建武兴国的同时,北魏也扶持杨文度族叔杨广香在阴平(今文县)建立起与武兴国并立的阴平国,实际上是将武都国瓜分为二,后为北周所灭,共传八代八主,历102年。这五个地方割据政权,因都为仇池杨氏所建,故一般都统称其为仇池政权或仇池国,前后延续近三百年,极盛期辖今甘、川、陕三省边境的6区18县。

隋唐以后,关中、中原一带的氏族逐渐消失了,河西、蜀地等地的氏族也很少见于史籍,这是由于随着氏族政权的垮台,起着保护本族语言、习俗的强力作用消失了,加之周围先进的汉族社会文明的影响,他们本民族的特征日渐淡化,最终融合于汉族之中,被同化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谈到这一点,



文县白马人少女(焦红原摄)

他说：“自十六国时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前凉除外）。一个少数民族人立起国来，散居在边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集合到本族的政权下，直入中原成为统治族。这个政权崩溃后，遗民难得再迁回原地，恢复旧生活，日久只能和杂居的汉族人融化。最古老的匈奴、氐、羌等族，以及较后起的乌桓、鲜卑等族，经过十六国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基本上不再见他们的活动，也就是说，融化到汉族里去了。”

陇南作为氐族的世居地，情况则与关中、中原、河西等地有所不同。一是此地为氐族发源地，豪酋大族，根深蒂固，不易被同化；二是唐中叶时吐蕃进入该地，而吐蕃社会文明程度又低于氐族，也难以被完全同化。因此，氐族势力及其民风习俗得以长期保存，特别是在文县及邻近的四川平武县的深山中，氐族文化习俗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今仍能看到其浓厚的遗迹。这一点，也为历代史家所注意。《元和郡县志》中记载：“石门出县东一百三十里，有石门戍。与氐分界，去仇池城四百余里。”清乾隆《皇清职贡图》中记载：“文县地连秦蜀，所辖番民，盖亦苗蛮之一种，与西陲诸番不同，居县属之下舍书、英坡山等处，明时设王、马二百户分领之。至本朝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年）改土归流，按地输粮，由县征解。男帽插鸡翎。每农事毕，常挟弓矢以射猎为事。番妇以布抹额，杂缀珠石，衣五色褐布缘边布，近亦多有效民间服饰者，颇勤。”文中所说“文

县番民”与“西陲诸番不同”十分重要。清同治、清光绪年间文县知事长斌在主持编修的《文县志·番俗》中作了进一步论证：“文番即氐羌遗种，昔年舍书居多。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年），改土为流，谓为‘新民’，已与汉民无异。上丹堡、下丹堡、柏元、糜地、岷堡、黄土地、白马峪七山头等处，仍与汉民杂处，富者衣服与汉同，余则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毡帽如盖，以鸡翎插之。其妇女织羊毛为褐衫，边镶大领，束以带，宽约八寸，耳坠大银环，重两许，不梳髻，惟结辮，以珊瑚、玛瑙、珍珠络之。性复嗜酒，



采草药的藏族少女



喜歌，侑客觞，不饮即跪唱酒曲，必饮而后止。丧礼不知成服，惟聚薪焚之，延僧忏悔，谓之火葬。”文中所描述的这些风俗风情，在今文县铁楼乡一带仍完整地保留着。他们自称为“白马人”。吴鹏鹞在《武阶备志》中也明确写道，自仇池政权灭亡后，氐人“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皆与汉民杂处，不复为乱。惟杨氏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迭、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直至今天，在武都、康县、成县、西和、宕昌等地，文中所说的这些大姓仍广泛存在，人数众多，并且往往整村或数村集聚，家族观念十分强烈。过去人们一般称其为“土户”，以便同后来迁移者相区别。白马人主要分布在文县白马峪河流域及邻近四川平武的白马乡和九寨沟县的部分地区，他们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仪式和方言、丧葬、饮食在不少方面都很特殊，既不同于藏族，更不同于汉族，很值得研究和探讨。他们有着独特的语言，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经过研究，认为“白马语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体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有很大一部分常用语言和西藏语相似或相同，但它和藏族相异部分远远超出了门巴语与藏语

之间的差别，甚至也超出了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因此，我初步认为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白马人的宗教为原始多神教，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白马老爷”为其最高偶像。白马人不信仰喇嘛教，和藏族有很大差异。葬式有土葬、火葬、水葬三种，没有明显的等级制度，与史书所载古代氐羌葬俗特别接近。在生活习惯上不食酥油及其他奶制品，更不吃生的牛羊肉。喜穿麻布。住板屋土墙，大都两档一底，下层堆放柴草或作畜圈，中层住人，三层堆放粮食杂物，中层左右两侧设有走廊。这与《南齐书·氐传》所载氐人“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相符。根据以上种种特征，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白马人就是古代白马氏的后裔。

陇南为氐人聚居区，但长期以来却很少发现氐人墓葬，这可能与氐人葬俗有关。《荀子·大略篇》云：“氐羌不虚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死后焚尸，这与华夏习俗迥然有别，这大概就是很难发现具有氐人特点墓葬的原因吧。当年，夏鼐先生在发掘寺洼文化时发现火葬习俗，就指出它与氐羌民族的习俗有关。

总之，随着对氐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氐族的源流情况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大约在商末周初，陇南境内又迁来一个新的民族，即秦族。

秦族，属嬴姓，其族源出于东方的东夷系统。据史书记载，秦人和殷人都我国东方的氏族部落，“玄鸟”（即燕）是他们共同的图腾。大约很早时，他们是一个部落，后来才分为两族。根据传说，秦族人的原始祖母名字叫女修。有一天女修正在纺织，忽然发现有只燕子落到自己的院子里，生下一个卵就飞走了。女修走出屋子，随手捡起燕卵就吞吃了，没想到，女修从此就怀孕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大业。大业成年后又娶了一个叫做女华的姑娘做妻子，生下儿子叫伯益。伯益聪明能干，曾经跟随大禹治理洪水。因治水有功，大舜就赏赐伯益姓嬴，并给他选了一名姚氏美女做妻子。从此，嬴族就开始兴旺起来。

夏王朝时期，秦人祖先大约活动在孟诸泽一带（今河南商丘以北到山东曹、单一带的沼泽地区）。因此，在秦惠公时，秦人与蜀人相争汉中之地，蜀人便骂秦人为“东方牧犊儿”。

前1600年，商汤灭夏时，秦人祖先费昌“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史记·秦本纪》）。由于在灭夏的过程中嬴姓氏族立有功劳，所以商王朝建立后，嬴姓氏族也成为统治阶层，其上层人物多成为显贵。“自（商王）太戊以下，（秦）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史记·秦本纪》）。

大约到殷商末年，嬴人的一支在其首领中谯率领下随商王西征戎羌，进至渭水中游后奉命屯守，遂营建城邑，定名为“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南）。“在西戎，保西垂”，他们守卫着商王朝的西部边疆。这时的“西垂”，并非地名，而是



礼县大堡子山



指商朝的西部地区,即今陕西省关中地区。纣王帝辛在位期间,崛起于岐、丰之地的周人四处攻伐,扩充势力。牧野一战,纣王“前徒倒戈”,兵败自焚,商朝灭亡。就在纣王众叛亲离、周人攻城掠地时,中潏这支嬴人据守的“犬丘”也为周人攻占。中潏之孙恶来被杀,他们被迫离开“犬丘”,沿渭河西进,以避周人锋芒。最后迁移至渭河以南、远离周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即今礼县东部一带。在这里修建了城邑,仍名“犬丘”。后来,人们为了区别于原“犬丘”,称其为“西犬丘”。有时也记作“犬丘”。

西周初年,又有一支嬴人迁到了“西垂”。周武王伐纣,灭了殷商,留居在东方地区的嬴姓民族自然也随殷人一起成为周人的奴隶。前1025年,纣子武庚起兵反周时,这些嬴姓民族也乘机反叛。《逸周书·作解》载:“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盈”,即“嬴”,“徐”

“奄”两国也是嬴姓。周公奉成王之命东征。历时三年,始平息叛乱。叛乱平息后,周人将被俘的“顽民”或充作奴隶,或迁离故土。嬴姓人也在迁移之列。他们中的大部分沿着黄淮流域流向西方。在长途跋涉中,有些嬴姓人中途停留下来,在当地定居、繁衍,但绝大部分被迁往当时周人的西方边境地区——“西垂”。在这里,他们与原替殷商保西垂的中潏后代合在一起,势力大增,秦人在西方的崛起,即自此始。

周孝王时(前891年—前886年),嬴族人的后代非子在西犬丘一带为周王朝养马,很有成绩,“马大蕃息”。西犬丘人将此事告知周孝王。周孝王十分高兴,便召其到今陕西千河、渭河交汇地区养马。西犬丘,范围大致在今天水、礼县、西和交界地带。其城邑所在地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西犬丘城邑在今礼县盐关一带;有人认为在礼县红河镇岳费

家庄附近;也有人认为在西和县长道镇一带。这三地虽然具体地方不同,但都在礼县东部。近年来,在礼县城东大堡子山、圆顶山一带发现秦公大墓和贵族墓群。有关学者认为,系秦仲、秦庄公或秦襄公、秦文公之墓。此山



礼县圆顶山

当为《史记·秦本纪》中“西山”无疑,则此可证,西犬丘、西垂宫当在大堡子山以东的长道、永兴一带。

由于非子替周王室养马有功,周孝王便把秦地(今清水县境内)封给非子,让他再接续嬴氏的庙祀,号称秦嬴。从此,“秦”就成为这部分嬴姓族人的称谓。同时,也让仍居住在西犬丘的大骆的嫡子成承继大骆的嗣位(成是非子的同父异母兄弟,申侯的外孙),继续掌管西垂事务。

前842年,周厉王荒淫无道,众叛亲离。西戎也乘机反叛,灭了居住在西犬丘的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后,以非子的后代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收复西犬丘,最终又被西戎所杀。秦仲共有五个儿子,长子名叫不其,后追封为庄公。秦仲死后,周宣王召见了他们五兄弟,给了他们士兵七千人,再伐西戎,终于打败了西戎。因原居住于西犬丘一带的成的一支被西戎所灭,故将西犬丘也归其所有,这样,庄公所辖之地除了原来的秦地外,还有了西犬丘之地。周宣王又封庄公为西垂大夫,继承了其父秦仲的封爵。

秦庄公设都邑于西犬丘,并建造了宫室,因其官职为西垂大夫,所以其宫室就命名为“西垂宫”。《说文解字》释:“宫,室也。”自此后,秦襄公、秦文公都居住在西垂宫。

秦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世父立下誓愿说:“西戎杀了我的祖父秦仲,我若不杀死戎王,绝不回犬丘来。”便将职位让给弟弟襄公,自己带兵攻打西戎。秦

襄公即位的第二年(前776年),西戎包围了西犬丘,世父率兵出击,战败被俘。过了一年,西戎才将世父释放回来。秦襄公七年(前771年),周王室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乱,西戎、犬戎和申侯联合攻周,攻破了国都镐京(今西安市西南),在骊山下杀了周幽王。秦襄公率兵救周,作战卖力,打退了西戎,并联合其他诸侯拥立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周王室为避犬戎之难,把都城迁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史称东周。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平王便封襄公为诸侯,并把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土地统统赐给秦国,而且同秦襄公盟誓:“犬戎凶恶无道,夺走了我们岐、丰的土地,只要秦国能把犬戎赶走,这块土地就归秦国所有。”秦国于这时才正式立国,国都仍在西犬丘西垂宫。前766年,秦襄公在征伐西戎途中死于岐山。他生有一子,即位后称秦文公。

秦文公即位后仍居住在西垂宫。前763年,秦文公开始东征,讨伐西戎,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收复周王室旧有的土地和人民,疆域扩大到岐山,并把岐山以东之地献给东周王室,势力愈来愈大。后经过秦宁公、秦武公等几代人的努力,秦国便逐渐东进,占领了渭水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与东面的晋国搭上线,发展成为西方的大国。在秦国东进的过程中,西犬丘之地一直是秦人稳固的后方基地。据《史记·秦本纪》载:前770年,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便在西垂作祭祀之坛,以祠先祖少皞之神。前716年秦文公死后,也归葬于西山。前385



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据考,“河西”当为“西”)而立之,杀秦出子及其母,沉于潭中。

关于秦人在西垂一带活动的资料,除了《史记》等文献有明确记载外,还有一些十分珍贵的文物资料,其中最珍贵的当属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其铭文记叙了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即秦庄公),驭(朔)方严允广伐西愈(即西隅,泛指西部地区),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汝御追于器,汝以我东宕伐严允于高陶,汝多斩首执讯。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车函(陷)于艰,汝多擒,斩首执讯。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海(敏)于戎工,锡(赐)汝弓一矢,臣五家,田十亩,用从乃事。不其拜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寿

元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用永宝永享。”意为:严允侵扰周朝西方之地,周天子命伯氏和不其抗击,追其于西地,得胜后,伯氏命不其率兵东进,斩获甚多,伯氏赏赐给不其不少东西。严允,即文献中的獫狁,有学者认为就是氏族,为周王室在西北的主要边患。

自嬴姓人中譙“在西戎,保西垂”,到秦文公东征,秦人在今礼县东北部营邑建都,东征西讨,达四百年之久。此后,秦人的中心虽然迁至渭河中游咸阳、西安一带,但礼县、西和一带仍是秦人主要活动区域之一。约在战国末年,秦在西垂宫故地设置西县,属陇西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令祠官常祠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在西县一带就建立神祠数十处。这已由礼县西汉水流域各处发现的“秦公簋”、“秦公壶”等一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物得到证明。

西汉时,西县仍属陇西郡。前206年,樊哙率兵攻击西县于白水之北。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刘秀亲征隗嚣至上邽(今天水),隗嚣逃奔西城。汉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围西城,并雍谷水灌西城,城没丈余。隗嚣部将行巡、周宗急率救兵赶到,隗嚣始得突围返冀(今甘谷县)。刘秀置天水郡,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更名为汉阳郡。西县先属天水郡,后随属汉阳郡。《后汉书·志二》载:“西(城),故属陇西,有冢山、西汉水。”三国时,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春,诸葛亮出祁山伐魏,魏遣大将军张郃击败蜀将马谡于街亭,诸葛亮遂拔西县千余家迁移汉中。自此以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翼虎

后,西县在史籍中就很少见到了。

西犬丘及西垂宫在秦人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秦人长期在这一带生活,促进这一带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使其成为向东发展、控制关中的后方基地。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所证明。

近年来,在礼县东10公里处的大堡子山发现秦人早期墓葬群。据有关学者判定,系秦人先祖秦仲、秦庄公之墓。墓内发现大批珍贵的青铜器和金器,有青铜鼎、壶、钫、盘、编钟、金虎、金棺饰等,现已大多流失。据国内考古界学者说,现有54件金棺饰,2只金虎,成对的秦公壶和成套的编钟,分别流失到英国、法国、美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从墓葬地域和出土文物可以判定,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西垂宫及西县的具体方位大致就在大堡子山以东附近的永兴、长道一带。秦人很早就已掌握青铜器、金器冶炼制作技术,表明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不亚于东方其他先进民族。同时,这也为秦人的由来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研究资料。

在秦史研究中,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历代皇帝的陵墓大都是坐北向南,唯独秦国的帝陵却都是坐西向东,不但春秋时代秦国诸侯的墓地凤翔秦陵如此,而且位于骊山西侧秦东陵(葬有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等)和骊山东侧的秦始皇陵都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秦人由西向东进入关中的历史轨迹和发展方向。坐西向东的特殊葬式也许是秦人对西垂故土的一

种怀念,专家们这样猜测。大堡子秦人早期墓葬的发现,也许可以解开这个谜。



悠悠
千年史

陇南自秦汉建郡县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两千年来,王朝屡更,行政建制时分时合,时废时设,治所也屡屡迁移,加之地处西陲,远离中原,古籍所载或疏漏、或讹误、或不详。因此,陇南行政建置情况只能作一基本概述。

先秦(前221年以前)时境内主要居民为戎、秦、氐、羌等部族。商末周初,居住于东方齐鲁一带嬴姓西迁至西犬丘(今礼县大堡子山东),其后裔非子在其地为周孝王养马。因功封于秦。周厉王时西戎攻杀西犬丘秦嬴大骆之族。后又杀秦仲。宣王遂命秦仲之子庄公兄弟将兵征伐西戎,授西垂大夫。战国时,秦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置陇西郡,今陇南北部属之,西县大约设于此,辖今礼县东、西和北及天水西南部。其余为氐羌等部族活动区,未纳入秦国版图。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陇西郡沿置,在今陇南北部设西县、羌道、武都道、下辨道、故道等,均属陇西郡。南部为巴郡(治江州,今重庆)辖地。

西汉初,陇西郡仍沿旧置。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郡析置天水郡,今西和县北、礼县等地仍属西



县,改属天水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发兵征西南夷,于白马氏地置武都郡,治武都道(今西和县洛峪),辖九县(道):武都道、上禄(治今西和县六巷乡)、河池(治今徽县银杏)、沮(治今陕西勉县沮水坝)、故道(治今陕西凤县,又说在两当县)、平乐道(治今康县平洛,又疑在武都区东固城)、嘉陵道(治今礼县)、循成道(治今成县谭河乡将利村)、下辨道(治今成县)。西县仍属天水郡。今文县地置阴平道,设北部都尉,属广汉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设十三刺史部,武都郡、广汉郡均属益州刺史部。王莽时改武都郡为乐平郡,武都县为循虏县,阴平道为摧虏道。秦汉时“道”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县级政权。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初年,将乐平郡复为武都郡,郡治移下辨道(治今成县抛沙,又说在红川),领七县:下辨道、

上禄县、武都道、故道、河池、沮、羌道(今武都西部及宕昌一带)。改天水郡为汉阳郡,西县随属之。今武都区境内设有武都西部都尉。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改北部都尉为广汉属国都尉,领阴平、刚氏、甸氏三道,仍属益州刺史部,辖今文县及四川九寨沟县等地。东汉末年,武都郡改属雍州。

三国时期,陇南为魏蜀相争之地。三国初年,魏以武都西部都尉署理陇南一部分地区。武都郡仍置,治下辨,领下辨、河池、沮、武都、故道五县。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汉中后,置阴平郡,治阴平大城(今文县西),阴平郡领阴平、广武二县,初属梁州,后属凉州。另外,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又徙武都郡吏民万余户于京兆、扶风、天水界,侨治武都郡于小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后魏文帝黄初中(约223年)又移至美阳(今陕西扶风县北)。

西县仍属汉阳郡。蜀汉后主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遣陈式攻取武都、阴平二郡之地,复置武都郡于下辨。魏亦遥置阴平郡于雍州。蜀汉亡后,武都、阴平二郡仍归魏。

西晋初,武都郡仍治下辨,属秦州,领县六



武都旧城山

个：下辨、武都、故道、河池、沮、修武（一作修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罢秦州，并入雍州，武都郡改属之。西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年）复立秦州，武都、阴平二郡仍属秦州，武都郡领下辨、河池、沮、武都、故道五县，阴平郡领阴平、甸氏、平武、刚氏四县。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氐人杨茂搜避齐万年之乱，自略阳（治今秦安陇城）率部落四千余家还保仇池，始建仇池国，治骆谷（今西和县洛峪），今陇南地区大部属之。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阴平郡人毛深等逐太守王鉴，降于成汉，郡人流入蜀地者又置二阴平郡，是为南北阴平郡。

东晋年间，社会动荡不安，群雄割据。陇南基本为氐族政权“仇池国”所据，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等政权，郡县废置极为频繁。杨茂搜建仇池政权后，始称臣于成汉，自置骆谷城，后朝贡于晋。322年又称藩于前赵，334年改属于晋，337年称臣于后赵，368年受封于前秦。371年前秦将苻雅等伐仇池，徙仇池居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前仇池政权灭亡后，383年杨定（杨茂搜之三代孙、苻坚女婿）亡归仇池，徙治历城，重建仇池政权。杨定死后，杨盛继位，不置郡县，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先称藩于东晋，旋称藩于北魏、后秦。

南北朝时期，今陇南地为南、北朝相争之地，南北朝双方以增加官职来吸引对方将领和奖励立功的将领，随意划分州郡，故百户之邑，便立州县，有时一州只领一郡或一县，有的郡没有属县，

只有一个空名，且废置频繁。氐族仇池政权仍据陇南大部分地区，时而降附于北朝，时而称臣于南朝。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攻破仇池，置仇池镇，辖武都、天水、汉阳、武阶、仇池五郡。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于仙陵山东抵龙岗（今武都区城关旧城山）置武都镇。宣武帝年间（500年—515年）于武都镇城复置武都郡，别置武阶郡（治今武都区桔柑大岸庙）、修武郡（治今成县将利）。北部仍属仇池镇，后改为南秦州。南部属氐杨武都国，治葭芦（今武都区外纳乡）。西部为羌族政权宕昌国属地。



武都西关城楼



西魏在今陇南地区设成州（由南秦州改，治今西和县洛峪），领仇池、潭水、汉阳等郡。设武州（由武都镇改，治安育，即今武都区），领武都、孔堤、白水、武阶、赤万、武阳六郡。设邓州（治今成县、徽县一带），领邓宁、昌宁、广化、广业、修城、盘头、两当等郡。今宕昌仍为宕昌国属地。北周建国后，在今陇南地区设有武州（治将利，由安育改）、成州、邓州、凤州、康州、宕州、文州等，领郡大致与西魏相同。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天下诸郡，由州直接管县，行州县二级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在今陇南地区设汉阳郡（原成州改，治上禄建安城，即今西和县西峪坪），辖今西和、礼县一带及岷县、宕昌一部；设宕昌郡（治阳宕，后改良恭，今宕昌县南阳），辖今宕昌、舟曲一部；设武都郡（原武州改，治将利，今武

都区石门），辖今武都、康县、文县等地；设河池郡（原凤州改，治梁泉，今陕西凤县），辖今两当、徽县、成县西北部及陕西凤县。今成县东南部属顺政郡（治顺政，今陕西略阳）。隋恭帝义宁初年（617年），析武都郡之曲水、长松、正西三县置阴平郡（治曲水，今文县城关西元村）。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以州领县，武都郡改为武州，宕昌郡改为宕州，汉阳郡改为成州，河池郡改为凤州，顺政郡改为兴州，阴平郡改为文州，属秦州总管府。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今陇南地区大部属陇右道。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更州为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郡为州。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后，吐蕃东掠，岷州、宕州、武州、文州、成州相继陷于吐蕃，州县俱废。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置成州行州于泥功山（今成县）。唐懿宗咸通七年

（866年）复置成州于宝井堡（今成县城关紫金山）。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置武州行州（治地不详）。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复立武州，治福津（今武都区东）。唐僖宗光启年间（885年—888年），因置武州于文德（今河北省宣化），



武都旧城中山街一角

故改陇右武州为阶州,因此地原系武阶郡地,故取“阶”字为名。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阶州改隶武定军节度。

五代十国时期,今陇南市境内州县建置仍沿袭唐制,设有成、阶、凤、文等州,先为岐王李茂贞辖地,后相继为后梁、前蜀、后唐、后蜀、后晋、后周所辖,为群雄逐鹿之地。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阶州州治由福津移抵龙岗东南平地(今武都区城关钟鼓楼滩)。

宋初仍袭唐制,分全国为十三道,阶、成、秦、渭属陇右道。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全国设十五路,陇南各州大部属陕西路。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分陕西路为四路,秦、阶、成、凤划入秦凤路,文州属利州路。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收复熙、河、岷、宕等州。同年,以秦州长道、大潭两县及临江寨(即今西和、礼县、宕昌等地)改隶岷州,州治移佑川(今宕昌县理川)。1129年,岷州为金人攻占,宋侨治岷州于白石镇(今西和县城西)。宋朝迁都南方,陇南遂为宋、金交战陈兵之地。至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今甘肃大部为金人所占,只有阶、成、凤、文等州仍为宋有。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为避金太祖完颜旻讳,宋改岷州为西和州(仍治白石镇,元朝复置岷州于今岷县),与阶、成、凤、文等皆隶于四川宣抚司、利州西路。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合利州东、西路为利州路,陇南各州属之。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后,西和、成、阶、宕、文、凤等州为蒙古军所攻占。蒙军在今礼县城关设礼店文

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陇南州、县俱废。

蒙元时期,蒙古军在甘肃境内设巩昌总帅府,下辖巩昌、平凉、临洮、庆阳、隆庆五府,阶、成、西和州属巩昌府。今礼县设有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文州设有文州西番万户府、文州上千户所。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复置阶州,州治移柳树城(今武都区角弓乡柳树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建立行省制度,实行省、路、州、县四级制。至元九年(1272年)复立文州,属吐蕃宣慰司,后并入脱思麻路。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明将徐达攻巩昌等地,西、礼、成、徽、凤州归属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明将傅友德攻克阶、文二州,降州为县,阶县移治抵龙岗(今武都区城关旧城山),文、阶二县均为陕西布政使司巩昌府所辖。又降成、西和二州为县。洪武十年(1377年)又升阶县为阶州,治砖城(今武都区城关莲湖公园一带)。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裁撤文县归入阶州,改置文县军民守御千户所。今宕昌、舟曲设西固军民守御千户所,均属岷州卫,后改为秦州卫。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复置文县。成化九年(1473年)割秦州一部置礼县。

清初沿明制,陇南各州均隶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巩昌府。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司,陇南属右布政使司(治巩昌,即今陇西县)。康熙六年(1667年),改陕西右布政



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次年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兰州）。康熙八年（1669年），正式改称甘肃省，陇南各州县入甘肃省。康熙十二年（1673年），裁西固守御军民千户所并入阶州。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反清，陇南各州县一度为吴三桂部所据。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年），升秦州、阶州为直隶州，降徽州为县，徽、两当、礼三县属秦州，文、成二县隶阶州，西和县仍属巩昌府，阶州直隶州设州判一员，驻白马关（今康县云台）。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年），设西固州同（治今舟曲县），于白马关置阶州分州。阶州治土城（今武都区城关），隶属于巩秦阶道（道署先治岷州，后移秦州）。文县、宕昌土司部分“改土归流”，部分仍然保存，但主要事务归州县受理。

民国政府于1913年宣布裁废清代省以下的府、州、厅制，实行省、道、县三

级制。改阶州为武都县，析西固州同辖地置西固县，改白马关分州为行政所，次年又改为警察所。陇南各县均属陇南道（治天水，后改渭川道）。民国16年（1927年），废道改区，渭川道改为渭川区，后不久又废，改为省、县二级制。民国18年（1929年）4月初，废白马关警察所，改置康县，县府设云台。民国24年（1935年），全省设七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在水设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陇南各县属之。民国27年（1938年），武都、文县、西固改属第一督察区（专署设岷县），其余各县仍属第四督察区。民国31年（1942年），增设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武都，辖武都、文、成、康、西固五县。其余各县仍属第四督察区。

194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确定将甘肃省划为九个分区和一个市，武都分区辖武都、西固、文县、康县、西和、礼县、成县七县，地委及专员

公署组建于西安（8月17日进驻礼县，12月11日移住武都县城）。徽县、两当县属天水分区，岷县属岷县分区管辖。12月9日，驻武都国民党119军起义。11日，文县和平解放。15日，解放军攻占碧口。至此，陇南全境解放。1950年5月



礼县古文庙

25日,撤销岷县分区,所属各县划归定西分区,岷县划归武都分区。1951年4月,武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为武都区专员公署。1954年6月,西固县治迁至宕昌镇。11月13日,西固县更名为宕昌县。原西固县一部分并入舟曲行政委员会,次年4月改称舟曲县。1955年2月10日,武都区专员公署改为武都专员公署。1956年2月10日,将礼县、西和县、成县划归天水专区管辖。1958年4月4日,撤销两当县,并入徽县。4月8日,撤销武都专员公署,所属宕昌、武都、文县、康县、岷县全部划归天水专员公署。9月5日,撤销西和县、礼县,合并设立西礼县,县政府驻礼县城关;撤销徽县、成县,合并设立徽成县,县政府驻徽县城关。12月20日,撤销康县(分别划归武都县和徽成县)、宕昌县(分别划归武都县和岷县)。1961年11月25日,国务院决定重新恢复武都专区。12月15日,决定撤销徽成县、西礼县,恢复宕昌、康县、徽县、成县、两当、西和、礼县,武都专区辖

武都、宕昌、文县、康县、成县五县。1963年10月23日,撤销临洮专区,岷县划入武都地区,全区共辖六县。同月,舟曲县博峪公社划归文县(1984年4月14日又划归舟曲县)。1968年7月7日,武都专区改称为武都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12月又改为武都地区行政公署,所属县未变化。

1985年5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武都地区更名为陇南地区行政公署,迁驻成县(暂未迁,仍驻武都县城关),将天水地区的西和、礼县划归陇南地区,原武都地区岷县划归定西地区。7月8日,撤销天水地区,设置天水市(地级),所属徽县、两当县划归陇南地区。至此,陇南地区共辖成县、康县、文县、武都、宕昌、西和、礼县、徽县、两当九县。2004年1月11日,国务院批准将陇南地区更名为陇南市,武都县更名为武都区。陇南市辖武都区、宕昌县、成县、康县、文县、西和县、礼县、徽县、两当县。市政府驻武都城关。



沧桑古史

史话南

前二二一年，即汉高祖元年，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刘彻出生于陇西成纪县，这是武都设郡的最早时间。武都郡虽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但武都作为行政机构设置，早在西汉初年就见诸史籍了。《汉书·高后纪》记载，高后二年正月乙卯，羌道山崩。《汉书·五行志》记载，高后二年春正月，





前111年，即汉武帝元鼎六年，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在击破南越后，乘胜进兵西南夷，在陇西郡东南白马氏人活动的地区设置了武都郡，郡治武都道，即今西和县南部的洛峪，古称“骆谷”。这是武都设郡的最早时间。

武都郡虽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但“武都”作为行政机构设置的名称，早在西汉初年就见诸史籍了。《汉书·高后纪》记载：“高后二年正月乙卯，羌道、武都道山崩。”《汉书·五行志》也载：“惠帝二年春正月，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即前193年和前186年陇南一带发生地震，武都道、羌道地震强烈。武都道发生山崩，压死七百六十余人。武都道建于何时，史书无明确记载，但至迟在汉惠帝二年（前193年）之前。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中认为：“武都疑秦已置县。”有可能在前279年秦国置陇西郡时，与故道、下辨道、上禄道等同置。道，是秦汉时中原王朝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级行政管理机构。武都道的范围大致在今西和县南部、成县西部地区。

汉初，武都、下辨、故道等为汉中郡

西部都尉所属，辖今西汉水中下游地区的西和县南部、成县、徽县及两当县、凤县等地。西部都尉与武都道同治骆谷。《华阳国志·汉中志十二》载：“武都郡，本广汉西部都尉治也。”西部都尉原属汉中郡，后改属广汉郡。广汉郡设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治绳乡，即今四川省金堂县赵镇，后徙梓潼。

汉设西部都尉时，今礼县及西和县北部等西汉水上游地区仍属西县，治今礼县大堡子山东一带，为陇西郡所辖。今文县地设阴平道，为蜀郡北部都尉所属，治阴平道，后又改属广汉郡。今武都区、康县等为白马氏部落辖区，未置道县。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后，广置郡县。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这里所载的“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即将原广汉郡西部都尉属地和白马氏人部落辖区合并建武都郡。这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得十分明确：“白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与《华阳国志》记载相吻合。

作为地名，“武都”一词的出现就更早了。《华阳国志·蜀志》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夷邪



歌》《陇归之曲》。”

这段故事的时代背景约在周显王在位年间(前368—前321年),早于武都建郡两百多年。故事情节虽几近神话,但在晋代以前流传很广,而且时间愈早愈真实可信,西汉扬雄在其《蜀王本纪》中记载:“武都有人,将其子女适蜀。不安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于武都担土,于成都葬之。盖地数亩,高七丈,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蜀王本纪》早已佚之不存,《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

宇记》都引之于《蜀王本纪》,但引文都不大相同,而且越来越神话了。如《北堂书钞》所引为:“武都有人,将其妻子女适蜀。不安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初学记》则演化为:“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精也,蜀王娶以为妻。”《太平寰宇记》则直接写做:“武都山精化为女子,美而艳,蜀王纳为妃。”于是,一个可能真实可信的故事变成神话了。

这个故事无论如何,起码可以说明,早在战国时期,成都近邻有个叫“武都”的地方,而且蜀王还同武都“女子”发生过婚姻关系。

那么,这个武都究竟在什么地方?据学者任乃强考证:武都即武都山。因战国时期尚未出现武都道。武都山有三处,一处在今四川省绵竹县山北伏虎坪,古称武都山。但此山因东晋刘宋时武都流民在此地拓荒耕种,因侨置武都郡,而后得武都之名。“扬雄、谯周诸人安得预知此山称武都?”一处在今江油县北,“同是后人伪托”。另一处即今西和县南之仇池山,仇池山旧名武都山。“武都山名仇池,谓其上原有一大池也。凡山上多森林者,山顶部必有大池。一般称为‘天池’,其例不可胜举。迨焚垦渐尽,林木渐荒,则乏根叶涵濡雨水,池也为之渐涸。魏晋世,此山区住民万家,林木当被摧败,故天池渐涸为泽。此‘常志’天池泽之实义。唐宋以后,林尽水竭,住民渐稀,记其地者不复见池,其山亦不为世所称矣”(《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陇南古民居

“武都”一词由来，自古便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武都得名，源于周朝文、武、成、康四个天子，故陇南有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实际上，这纯属牵强附会，因为这四个县的建置时间各不相同。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较广，因过于荒谬，也早为文人学者所驳斥。清代甘肃学政陆延黻说：“周时地尚属戎羌，采邑何能界远方？文武成康名郡县，后人附会太荒唐。”（《阶州直隶州续志·艺文上》）另一种说法是用汉字诠释，“武”，即宏扬武力，当为颂其武功、扬其威武拓疆之意；“都”，即“渚”，水停、聚的地方，也即天池大泽，引申为人口稠密之意。这种说法的根据，最早载之于《汉书·地理志》。在“武都县”条下注“天池大泽在县西”。晋常璩《华阳国志》记作：“武都县，西汉水所出，有天池泽。”显然是沿袭《汉书·地理志》。以后有关史籍大都承袭这种说法，并加以引申。如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因有天池大泽，故县称武都。”唐代颜师古在注解《汉书》时，也称：“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从这几条史料我们不难看出“武都”与“天池大泽”的关系。由“天池大泽在县（武都县）西”演变成了“天池大泽”即“武都”，显然有误。从文字组合上讲，也无法将“武”（弘扬武力）与“都”（天池大泽）合理地连接起来。

另外，关于“天池大泽在（武都）县西”的记载也语焉不详，令历代方志学者大伤脑筋。一般认为“天池大泽”即仇池山，而西汉武都故城即今西和县南洛峪。实地勘察，洛峪位于仇池山西北面，

恰与《汉书》所载相背。最近，当地史志工作者考证，认为武都故城在今西和县喜集乡杨马城（也写作羊马城），古城遗址仍存，并有大批汉魏墓葬发现。该城位于仇池山以北，隔洛谷水（当地人称羊马河）与仇池山相望，仇池山位于城南，也与《汉书》所载不符。因此，这条记载是否讹误，也值得怀疑。

仇池山古称“瞿堆”，又名“仇维”，二者古音相近，为同音异形，“瞿堆”“仇维”是汉族史家对氐人语言语音的汉字记录。今四川省都江堰市的乌尤山古称离堆。《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该地古代也为氐族聚居区，“离堆”大约也是氐人对乌尤山的称呼。至于“仇池”，因仇池山上多水池，遂改“仇维”为“仇池”。《开山图》又写做“仇夷”。又因山上有平田百顷，故又称为“百顷”。有时又“瞿堆百顷”（《华阳国志》）与“仇池百顷”（《仇池记》）并提。“武都山”之名则是因仇池山地处武都道，山以道名，而非道以山名。《汉书·五行志》所谓“武都道山崩”，此山便是仇池山，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西晋初年，仇池山又发生过一次崩坍。据《晋书·五行志》载：“晋武帝太康七年二月，阴平之仇池崖陨。”阴平应为武都。

既然武都道得名并非来自武都山，“采邑”说难以成立，“宏扬武力”也属牵强附会之说，那么，“武都道”究竟是怎么得名的？“武都”又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陇南古为戎、羌、氐族居住活动区，加之地处西陲边僻之地，中原史官对其了解甚少。因此，保存在史籍中



的有关陇南古史资料不多,尤其是秦汉以前,更属凤毛麟角,或遗漏,或讹误,或略而不详,令后世研究者如坠云雾之中,难以理清头绪,如武都得名问题便是其中一例。

由《华阳国志》所载可知,“武都”作为地名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大体方位在今西和县南部的仇池山附近。约在秦朝时,在这里设置了武都道。在这段时期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氏族一直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居民。特别是仇池山地区,在唐宋之前,一直是氏族的根据地。所以,研究仇池历史,不能不研究氏族历史,同样,要搞清“武都”的由来,也必须从研究氏族历史入手。

近年来,四川学者在研究巴、蜀、成都等地名由来时,大都从研究氏、羌民族入手。如温少峰在《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蜀地先民源自氏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今滇、黔北部及四川西部“皆氏类也”。而这些地方古地名都称“都”,如笮都、邛都、徙都、广都、新都、成都以及武都等,如今氏、羌后裔普米族语言至今仍称地方、地域为“都”,可知“都”在古代蜀语中就是“地方”“地区”之义。而“成”与“蜀”古意相近可通,在氏羌系语言中乃是蜀人族称,就是“高原人”之意。所以“成都”在古蜀语中应是“高原人居住的地方”,“成都”二字乃是用汉字记下的古蜀族语言。谭继和在《成都古为巢居氏族居住地续说》一文中进一步考证,在今川西北藏族语言中,称村、街、都市为

“都”,而这一带恰好是古代白马氏人聚居的地方。

由此可以佐证,“武都”也应当是用汉字记下的古白马氏族语言,是居住于仇池山一带氏人的自称。武都应读做“wūdù”。前音节高,后音节低,一气读出,而不应读成普通话的“wǔdū”。汉族在用汉字记音时,考虑到仇池一带的氏族的特征,即“迫近戎狄”,修习战备,尚气力,以射猎为主(《汉书·地理志》),“古为用武之国”(《翰墨大全》)等,所以不写做“巫都”、“吴都”而写做“武都”,还是比较准确的。

另外,据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姓氏大全》载,古代有姓“武都”者,为羌族姓氏,分布于甘肃地区。

汉武帝置武都郡,据《汉书·地理志》载,有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领九县,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辖区范围大致在今西汉水中下游及嘉陵江上游地区。相当于今西和县南部、成县、康县、徽县、两当县及陕西省略阳县部分地区。

同其他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一样,武都郡属于“初郡”,也称“边郡”或“新郡”,在机构设置上不同于内地郡县。除朝廷委派的太守、令、长掌治郡县外,还拜封了一批当地的氏族豪酋充任王、侯、邑长。朝廷派任官员有任期,随时流动,称“流官”,当地选任的则称“土官”,终身任职,可以世袭。流官治其土,土官治其民,流官通过土官进行统治。还有一点,流官不得干涉当地民族风俗

习惯。另外,还特别规定,初郡百姓不征税收,仅由土官负责征集一定数量的布及其他方物如时进贡即可。初郡官吏的俸食及车马用具,也由邻近郡县供给。

以上这些规定,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氐人的负担,不但弱化了氐人的反抗,而且有利于密切氐人同汉族地区的关系。氐人可以不受官府限制,自由地购买汉族地区的铁器、铜器和一些生活品,从而促进了氐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氐人内部阶级的分化,为以后统治者实施分而治之政策创造了条件。

东汉时,武都郡治由骆谷移至下辨(今成县),属县也由西汉时的九县省为七县,即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羌道。此时的武都郡,已成东汉王朝与陇右割据者隗嚣、西蜀割据者公孙述逐鹿之地,后又与东进的羌人争斗百余年,其战略地位日显重要。于是,武都竟成为东汉王朝名将重臣云集之地。知名者如吴汉、岑彭、来歙、马援、孔奋、廉范、马融、虞诩、赵冲、李翕、耿勋等。

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年)六月,汉光武帝刘秀派中郎将来歙率军与隗嚣、公孙述联军会战于河池、下辨,汉军大胜。来歙欲乘胜入蜀,蜀人大惧,公孙述部将环安派遣刺客杀死来歙。刘秀得讯后大惊,痛哭流涕,亲写祭文:“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派专人护丧。灵柩运到洛阳时,刘秀亲自送丧。

孔奋任武都郡丞时,其妻子、儿子均被隗嚣部将隗茂押为人质,以图阻止

孔奋的追击,但孔奋仍紧追不懈。隗茂便将孔奋妻子和儿子推出军前以挡汉军,但孔奋义无反顾,攻击愈烈。其妻子、儿子遂被害。汉军获得大胜,并擒获了隗茂。刘秀下诏褒扬孔奋,并提升他为武都太守。孔奋在任内“为政明断,甄善疾非,见有美德,爱之如亲,真无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称为清平”(《后汉书·孔奋传》)。

廉范是廉颇的后代,汉明帝永平年间(58年—75年)曾任武都太守,任内“随俗化导,各得其宜,郡中大治。民歌曰:‘廉叔度,来何暮!昔无襦,今五裤’”。

著名经学家马融年轻时曾客居武都、汉阳界,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曾任武都太守。上任时正值西羌反叛,马融请求朝廷派兵攻击,未被采纳。在任期间,设绛帐台于今成县抛沙广化村,教养诸生。马融学识渊博,遍注《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孝经》及“三礼”,其古文经学达到成熟的境地。生徒常有千余人,郑玄、卢植都出其门下。史载马融讲学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入室者”。

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任职武都太守的虞诩,政绩十分突出。他在赴武都任职的途中,就用“增灶”法逼退了羌兵。当时羌人攻城掠地,邓太后闻虞诩有将帅之略,诏为武都太守。武都羌人得到虞诩前来任职的消息后,便派兵数千入设伏于崤谷(今陕西省宝鸡西南)截击。虞诩侦知后传言与羌人,声称暂



不赴武都，待羌人撤伏后又急速前进，日进两百里，并下令属下每人各做两灶，次日做四灶，后每日倍增，羌人以为有援兵，不敢发起进攻，只得远远地跟在后面。部下问虞诩：“孙臧当年用减灶之法大破魏军，今天您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怎么回事？”虞诩说：“当年孙臧减灶是示弱，目的是诱敌深入，而我增灶是示强，目的是阻滞羌人来追，这是因为形势不一样的缘故啊！”

虞诩顺利到达郡治下辨，此时，羌兵数万人围赤亭城已数十日。虞诩又采用先用小弩射击诱其靠前，后用强弩劲射的办法杀死许多羌人。此后，又令军队东门出，北门入，反复多次，使羌人搞不清城中有多少军队。就在羌人准备撤退之时，虞诩又派五百精兵设伏于河边，羌人退逃至此时，伏兵突然进攻，杀死及俘虏数千。自此以后多年，羌人再无力集结。

虞诩另一件值得称颂的业绩就是亲自勘查，并率领官吏百姓烧石剪木，开通了下辨至沮（今陕西略阳）的航道，特别是清除了下辨东三十余里峡中的大石，不但利于船运航行，而且避免了“泛溺溢没”之患。在当时条件下，清除巨石，他采用烧石浇水的办法，使石头骤热骤冷，自行碎裂，堪称奇迹。据专家考证，褒斜道石门的开凿，也是采用这种办法，被看作是古代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群雄逐鹿。

割据豫、兖诸州的曹操，在官渡一战中击败袁绍，尽占黄河以北之地。为了统一整个北方，进而进军巴蜀、荆楚，曹操在赤壁被孙吴联军击败之后，便调集兵力，全力经略陇右。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统曹仁、徐晃西渡黄河，击败马超、韩遂的陇右联军。次年，又策动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兵围攻冀城（今甘谷县东南）、卤城（今礼县盐关）。马超被迫逃至汉中，陇右遂为曹操所据。之后，又挥师南下，攻掠陇南。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三月，曹操亲率大军自陈仓出散关，取道武都攻汉中张鲁。武都氏人沿故道堵防。曹操大军被迫窜行山谷，“军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险阻，军人劳苦”。四月，又败氏王寔茂于河池，略定陇南。氏人被杀者无数，有五万余户被迁往扶风、天水界居住。夏侯渊在攻击下辨、故道时，还收掠氏人谷物十余万斛。十二月，曹操北返，留夏侯渊、张郃屯守汉中。

就在曹操经略陇南的同时，占据四川的刘备也图谋染指陇南。汉献帝建安

二十二年(217年)冬,刘备、诸葛亮乘曹操与孙吴交战无力西顾之机,决定“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刘备使诸葛亮总理后方粮草的供应,亲率赵云、黄忠、魏延等出马鸣阁道(今四川省青川县马角坝),攻克马鸣阁后,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次年春,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击杀夏侯渊,迫使张郃退守阳平关。同时,另派张飞、马超率吴兰、雷同等部攻占下辨,并留吴兰守下辨。曹操派曹洪驰援。刘备令张飞赴固山,欲断曹军后路。第二年春,曹洪攻击下辨守将吴兰,吴兰逃至阴平,被当地氏豪强端所斩。张飞、马超进无所据,退至汉中。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再次率军临汉中,在定军山一带与蜀军对峙两月余,因军心涣散,士卒逃亡,不得已撤军回长安。又遣曹真至下辨,令曹仁退兵屯守陈仓。这样一来,陇南及汉中均为刘备所得。自此以后,魏蜀两国为控制陇南及陇右地区展开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激烈角逐,成为三国后期魏蜀交兵的主要战场。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死白帝城。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诸

葛亮十分重视经营陇南,在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北伐,希冀占据陇右,并以此为基地东攻长安,进而统一全国,完成“兴复汉室”大业。罗贯中在其小说《三国演义》中以“六出祁山”来归总诸葛亮的北伐业绩。实际上,据史志记载,诸葛亮指挥的北伐活动共有四次。因这些战事大都发生在今礼县东部西汉水沿岸的祁山地区,并且都由蜀汉军北进所致,故称“出祁山”。

第一次“出祁山”发生在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年)。此时,诸葛亮已平定南方,准备乘士气高昂之际出兵北伐。为此,特作《出师表》奉与后主,说明北伐的原因,提出要亲率三军,北平中原,“克复汉室,还于旧都”,以实现先主刘备的遗愿。这便是封建时代文人无不诵习的《前出师表》。在后主应允后,诸葛亮亲率大军十万入汉中,屯兵于沔北、阳平、白马等地(均在今陕西勉县境



远眺祁山





内)。这年刚刚开春,在汉中休整了近一年时间的蜀军开始北进,蜀兵分两路,一路由赵云、邓芝先行,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扬言出斜谷道攻眉(今陕西眉县)。魏果然中计,派大将军曹真率大军加强对褒斜道的防御。诸葛亮见魏中计,便率大军六万进攻祁山。据载,诸葛亮大军军容整齐,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深受陇右吏民欢迎。南安(郡治今武山县西北)、天水(郡治在今甘谷县东南)、安定(郡治在今镇原县南)三郡军民纷纷“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三郡降蜀,将魏与金城、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六郡道路截断,关中处于蜀汉直接攻击之地。魏国朝野震惊。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命张郃督步骑兵五万出长安西进。就在这关键时刻,诸葛亮没有用魏延、吴懿等一班久经沙场的老将为先锋,却命参军马谡驻守事关全局的军事要地街亭(今秦安县东北部)。结果,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制,也不听副将王平的忠告,舍水上山,凭高结营,被张郃围困后切断水源,蜀军不战自乱,马谡只好逃跑。

街亭一失,魏军长驱直入,蜀军无招架之力。加之祁山城堡(今礼县祁山堡北三里)也未攻克,驻守西县的诸葛亮“进无所得”,只得“迁西县千余户还于汉中”,退回原地。诸葛亮在挥泪斩马谡后,也因“援任无方”,上疏后主请求自贬三等,以后将军职行丞相事。蜀军退回汉中后,南安、天水、安定及武都、阴平二郡又为魏军所占。这次出祁山虽然失败了,但诸葛亮却得了一个栋梁之

材,此人便是以后支撑蜀汉大局的姜维。诸葛亮对其十分赏识,称赞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都是诸葛亮手下干将。

这年十一月,诸葛亮又举行第二次北伐。当时,魏吴战争又起,吴将陆逊击败曹休于石亭,驻守关中的魏军被调南下攻吴。诸葛亮见有机可乘,决定再次北伐。蜀军于十二月出兵,沿故道北进,出大散关,于蜀汉后主建兴七年春(229年)时围陈仓(今陕西宝鸡)。魏守将郝昭、王生采取紧闭城门、固守不出的策略与蜀军相持。蜀军围攻二十余日仍不能攻克,最后因粮草不济,加之张郃也引援兵西进,蜀军只好引退。退军之际,诸葛亮命将军陈式分兵西掠武都、阴平二郡。陈式兵抵下辨,魏雍州刺史郭淮带兵来挡,被诸葛亮伏兵击败于建威(今西和县)。蜀军乘胜追到祁山。郭淮败退,武都、阴平二郡又被蜀汉占领。

第三次北伐发生在蜀汉后主建兴八年(230年)七月。魏明帝兵分三路攻汉中,张郃一路自陇西南下,直攻白马关(今康县云台镇)。为牵制张郃兵力,诸葛亮遣魏延、吴懿自河池出祁山西入羌中,扰乱魏军后方。张郃闻讯,急忙退守上邽(今天水)。魏延、吴懿率军到达洮水西岸,辗转数月后引兵东归。十一月,行至首阳(今渭源县东南首阳镇)之南的阳溪时被魏军郭淮包围。诸葛亮急率大军接应,夹攻魏军。郭淮急忙撤军退回狄道。当张郃领大军赶到首阳时,

蜀军已退回汉中。

诸葛亮北伐的最后一战发生在祁山一带。蜀汉后主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自汉中出发北进,并用“木牛”运粮,以图一举攻占要地祁山。魏军主将曹真得知蜀军以一师之众出祁山,留大军在汉中,恐其声东击西,便一面下令陇西、上邽等处魏军坚守勿动,一面诏令驻扎南阳的司马懿前去解围。司马懿率军赶到祁山时,正值魏军郭淮失败,上邽失守之际,于是,便放弃祁山,回军驻扎在上邽东面的山上固守不出。其时,祁山一带小麦成熟,司马懿料定出战已久、粮草匮乏的诸葛亮会抢割小麦以资军需,便暗中令郭淮伺机突袭。诸葛亮也料定司马懿会有此一着,就带少数兵力诱走司马懿追兵,却派姜维、魏延率领将士突击割麦。等到司马懿发现上当回兵追赶时,蜀军已将小麦运往卤城(今礼县盐关镇)晒打了。

气急败坏的司马懿又命郭淮奔袭蜀军粮道,同时联络西凉兵倍道驰援,夹击蜀军。诸葛亮趁西凉援军远道而来、人困马乏之际,命蜀军趁夜偷袭其营寨,大获全胜。诸葛亮为寻找战机,主动退出上邽。司马懿举兵追击。

蜀军退至西城(今礼县永兴境内)后布阵,魏军却退于山上掘堑以守。后司马懿经不住蜀军叫阵,于五月初十日出战,军出即败,损失甲士3000多,玄铠5000领,角弩3100张。司马懿屡战屡败,被迫退回上邽,坚守不出。正当诸葛亮准备乘胜东进的关键时刻,主管粮草供应的中督护李严,因雨误期,怕丞相见罪,派参军马忠、督军成藩假传后主旨意,令诸葛亮退军。诸葛亮只得放弃祁山南归。司马懿急令张郃追击,诸葛亮设伏于木门山(今礼县东北)中,魏军大败,大将张郃也中箭而亡。

诸葛亮四出祁山,志在必得,但陇右关系重大,曹魏拼力死守,因此,蜀军屡次进攻,虽有小胜,却无大功。此后多年,蜀军再无北进行动。直到三年后,即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才以养精蓄锐之师十二万,沿褒斜道北出,进抵渭水,屯兵五丈原,准备同



祁山武侯祠诸葛亮塑像

魏军决战。但狡猾的司马懿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蜀军只好就地屯田垦荒，等待战机。当年八月，诸葛亮病死军中，北伐之事也暂时停止。

诸葛亮死后，蜀后主任姜维为凉州刺史，统辖武都、阴平等地事务。蜀汉后主延熙九年（246年），姜维受任为蜀卫大将军，得以参决政事。此后，他继承诸葛亮的北伐事业，先后七次北伐，六次兵出陇南，但大都劳而无功。

蜀汉后主延熙十年（247年），秦、凉二州“羌胡”叛魏附蜀，姜维率军北上接应，在洮水以西地区同魏将郭淮、夏侯霸激战，旋将附蜀的羌胡豪帅白虎文、治无戴及其部将带回汉中。两年后，姜维又率兵万人北进，以图招诱羌人为蜀羽翼。姜维筑城于洮山（今岷县东），使句安、李歆守御，自率兵士别攻他郡。雍州刺史陈泰率徐质、邓艾围洮城，切断蜀军粮道水道，使蜀军陷于困境。姜维

被迫撤军，邓艾追至白水北岸始停。

蜀汉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年）春，姜维又统兵数万，取道石营（今西和县石堡镇），过董亭（在今天水西南），围南安。在洛门（今武山县境内）同陈泰相对峙，后因军粮不继，又自行退军。同年六月，攻陇西，拔狄道，围襄武（今陇西县西南），击败徐质，徙河关、狄道、临洮三县居民而还。

蜀汉后主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又带兵出陇南，在洮水以西的故关同魏雍州刺史王经交战，消灭魏军数万，进围狄道。陈泰惧怕姜维在此招集羌胡，便亲率大军解围。姜维恐退路被截，便主动撤军至钟离（在今成县西北）。次年春，姜维受命为蜀大将军，七月，引军出钟离，准备打南安。邓艾在渭水北岸截击。姜维转攻上邽，行至段谷（今天水南），与邓艾相战，蜀军惨败，损失巨大。此后，姜维又兵出骆谷，采取迂回夺取

秦川的策略，最后也无功而返。

姜维屡屡北伐，劳师动众，引起蜀中百姓怨恨。朝廷中宦官黄皓、右大将军阎宇也乘机策划废去姜维。姜维自知积怨甚重，不敢返回成都，只好率军到沓中（今岷县、迭部间）屯田以避祸。



宕昌邓邓桥

当他得知魏将准备南攻成都时,曾上表请求派张翼、廖化带兵出守阳安关口(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与阴平桥头(今文县东玉垒关),以防患于未然,但不为后主所纳。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八月,司马昭议决灭蜀,命钟会任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负责攻蜀军事;邓艾为镇西司马,负责扼制姜维,将其拖在沓中,使其不能东顾;同时,还派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军三万,由祁山进驻武街,绝姜维归路,并相机占据阴平桥头,以防备姜维入援蜀中。这年九月,钟会统兵十二万由长安出发,兵分三路,分路从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攻入汉中。此时,蜀后主才布置防御措施,一面派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增守阳安关口,一面遣右车骑将军廖化援助姜维。廖化在行军途中得知诸葛绪已带兵向建威,拟攻阴平,便驻军以待。

驻守沓中的姜维在邓艾的重兵包围下苦战不胜,便突围撤退。退至强川口(今宕昌县两河口。强水,即今岷江,又称羌水)时受到天水太守王欣袭击,损失惨重。姜维沿羌水南撤,闻诸葛绪已抢占桥头,便率军北进,诱使魏军弃守桥头,然后调头回军桥头。退至阴平与廖化合兵后,得知阳安关口情势危急,便又前往增援,途中得知蒋舒已献关降魏,便退守剑阁。

钟会进至剑阁后,受到姜维的顽强抵抗,被拒于剑门关外而不得进。邓艾进军到阴平后,闻知翻越摩天岭(在今

文县南部)后即可南下江油(即今四川江油县南坝),即上书司马昭,要求出阴平斜径攻成都,得到司马昭同意。

十月中旬,邓艾亲率精兵三万余人,沿白龙江东行至阴平境内附近,走荒僻小道,越摩天岭(又名青塘岭)后进至乔庄(今今四川省青川县境)地区。在翻越摩天岭时,道路十分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在果阳坝(四川青川县北)俘虜了自剑阁往援江油的蜀将田章。然后自青川越龙门山至江油,俘蜀江油戍将马邈。继而攻绵竹,蜀卫将军诸葛瞻孤军苦战,拒不投降,直至战死。蜀后主刘禅闻绵竹已失,自知成都无险可守,便放弃抵抗,自缚双手,抬着棺材到城外邓艾军营前投降。魏军不战而入成都。至此,立国四十三年蜀汉政权灭亡。

刘禅投降后,还致书勒令据守剑门的姜维投戈放甲,投降魏军。据说消息传来,姜维帐下众将一片怨恨,个个咬牙怒目,须发倒竖,拔刀砍石,大呼:“吾等死战,何故先降也!”号哭之声闻数十里。不得已,姜维与张翼、廖化等也在涪城(今四川绵阳)投降钟会。不久,姜维参与钟会密谋,准备反魏,不料事泄被杀。据裴松之注引《世语》载:“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

魏蜀最后一战,以蜀灭亡而告终,随着蜀国的灭亡,魏蜀对陇南的争夺也告结束。历经数年战乱的陇南百姓,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话仇池
金戈铁马



在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陇南地区先后出现过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四个氐人政权和宕昌国一个羌人政权。这几个政权前后经历二百八十余年，与南北朝相始终。作为南北大国夹击之中的地方政权，能够维持这样长的时间，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仇池国因仇池山而得名。仇池山位于今西和县南九十余里的大桥乡，南滨西汉水，北临杨马河，三面环水，四面陡绝，上有平地百顷，泉水数十眼。自古以来，就是氐族的重要活动区域。

仇池氐人的崛起，始于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中（约210年左右），氐族部落首领杨驹保据仇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了他儿子杨千万时已初具规模，自称“百顷王”（仇池山顶有平地百顷，故时人又称仇池山为百顷山）。附于曹魏政权后，被拜为百顷氐王。

不久，凉州马超、韩遂、杨秋等率众十万反叛曹魏。仇池氐王杨千万响应马超号召，率众离开仇池北上，与占据今甘肃秦安一带的兴国氐王阿贵合为一体，支持马超。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由于内部变乱，不得已投奔汉中张鲁，借兵围攻祁山。留守长安的夏侯渊急忙命部将张郃率轻骑五千，从陈仓（今陕西宝鸡）沿渭水至天水，击败马超。马超逃入武都境内，随后又转奔汉中投靠刘备。兴国氐王阿贵战败，杨千万也率少数将领投奔蜀汉，其部众全部投降曹魏。次年，曹操害怕刘备联合氐人对抗自己，就下令“徙武都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攻下辨。氐人首领雷定率部落七万余户予以响应。曹操十分惊恐，又徙氐民万余



西和发现的三枚氐、羌王金印

户出居京兆、扶风、天水界，并将武都郡侨治于小槐里（今陕西兴平县西），后魏文帝黄初中（220年—226年）又移置美阳（今陕西扶风县北）。仇池山一带的氐人几乎被迁徙一空。

杨千万入蜀后经过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了孙子杨飞龙时，才又逐渐恢复元气，并接受了西晋的封号，以假征西将军名义，率部落“还居略阳”。杨飞龙无子，抱外甥令狐氏子为宗子，这便是开创一代仇池国史的杨茂搜。

杨茂搜是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氐族领袖人物。他还保仇池后，充分利用这里山川险要、河流湍急的地理优势，打着自保旗号，广开贤路，招纳四方豪杰，不但使受到战乱威胁的氐族部落纷纷归依，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关中士人。《晋书·张轨传》记载：“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茂搜征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一时间，仇池成为关中流亡士人的避难所。自此，仇池声名享誉海内，对后世影响极大，有不少人视仇池为“洞天福地”的仙境。杜甫曾向往“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苏东坡不但梦到仇池，而且还将一奇石命名为“仇池石”，将他的读书笔记命名为《仇池笔记》。

仇池政权的日益强大，使得中原王朝不得不刮目相看。晋愍帝不但承认了仇池政权的存在，并且还封杨茂搜为骠骑将军、左贤王，甚至连他的儿子杨难敌也被封为“征南将军”。1961年，在西和县南与仇池山一水之隔的西高山上出土了两颗金印，金印均有虎形钮，印

面方形，边2.2厘米，无廓。其中一方阴刻篆文为“晋归义氏王”五字，另一方亦阴刻篆文为“晋归义羌侯”五字。“归义”是中央王朝对远夷酋长所授的封职。当中央王朝强盛之际，四夷内附，称之为“归义”。所以，此印当在晋王朝处于强盛时期的武帝至惠帝之间所封。汉末羌人势力衰弱，氐人势力强大。晋王朝采取封官授印的拉拢手段，目的是致氐人于其控制之下。后又发现一枚“魏归义氏侯”金印。三枚金印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杨茂搜卒，其子杨难敌即位，号左贤王，屯下辨。其弟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今徽县）。此时，仇池国政权中心已从仇池山区地带移至徽成盆地，疆域扩大到以西汉水流域为中心，西南至白龙江，东至嘉陵江上游，纵横数百里，今陇南地区大部都在其控制范围之内。

晋元帝大兴四年（321年），前赵刘曜先后两次攻伐仇池，杨难敌称藩于后赵，后赵封杨难敌为持节使、武都王等职。次年，占据陇右的陈安反叛前赵被杀，杨难敌也自感不妙，与弟杨坚头南奔汉中，投靠成汉李雄。前赵镇西将军刘厚追击，缴获杨部辎重千余辆，仕女六千余人，仇池为前赵所据。杨难敌臣服于成汉李雄后不久，闻前赵退兵，又叛成汉返回武都，驱逐了成汉阴平太守罗演，占据阴平。成汉大将李琚、李稚讨伐杨难敌，被杨难敌设伏围歼于下辨。杨难敌乘胜收复了仇池，杀死前赵仇池镇将田嵩。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成



汉大将军李寿进攻阴平、武都，杨难敌不胜，遣使称臣。同时又送表于长安，同前赵讲和。

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杨难敌卒，子杨毅立，自号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并以其叔父杨坚头子杨槃为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杨毅又遣使称藩于东晋，晋封杨毅为征南将军，杨槃为征东将军。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杨毅被族兄杨初袭杀，并领其众，自立为仇池公，向后赵称臣，后又遣使称藩于晋穆帝。从这时起到晋穆帝升平四年(360年)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仇池政权内部连续发生了四起内讧事件，自相残杀，国势急剧衰落。

就在仇池政权内讧不休之时，北方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350年后赵灭亡后，秦陇一带群雄纷起，一时呈无政府状态。势力强盛的仇池本来完全

有可能乘机北出，逐鹿中原，扩充势力，但却因国内频发变乱而力不从心。结果，让居住于略阳临渭(今天水市麦积区东)的另一支氏族苻氏集团捷足先登，抢先进入关中，建立了前秦政权，短短几年时间，便占据了整个北方地区。

371年，前秦苻坚乘武都太守杨统起兵与新立仇池王杨纂争位之机，遣苻雅、杨安、王统、姚萇等率步骑七万进攻仇池，很快就打败了仇池军以及前来增援的东晋军队，杨统、杨纂相继投降，仇池政权暂时中断。史家一般称这段时间的仇池政权为“前仇池国”，前后存在时间为七十五年。前仇池国灭亡后，苻坚为充实前秦统治力量，徙仇池居民于关中，百顷之地遂空。仇池杨氏被迁到关中后，贵族酋豪都得到重用，杨茂搜的第三代孙杨定被苻坚招为女婿，封为前秦将军，杨纂则被杀。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苻

坚南伐东晋，淝水一战，前秦大败。杨定仍尽力侍奉苻坚，支撑残局。不久，苻坚被部将姚萇杀死，姚萇攻入长安，即皇帝位，建后秦。前秦太子苻宏将数千骑与母、妻、宗室逃奔下辨，前秦南秦州刺史杨壁拒之。苻宏又转奔



故道旧城杨店(两当县)

武都,后辗转投奔东晋。杨定也逃归陇右,徙治历城(在今西和县西峪坪,后改为建安城),称藩于晋,拥立前秦宗室苻登为帝,自号仇池公。晋割西县、上禄地与杨定,杨定使杨盛守仇池,再建仇池政权,史称“后仇池国”。自此以后,杨定以仇池山为根据地,屡挫后秦军,夺取了秦州、上邽、略阳等地,仇池国不仅得以复兴,而且大大地向北扩展了疆域。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年),苻登之子苻崇投至杨定处,杨定率兵攻陇西鲜卑乞伏乾归(西秦王)。会战中,西秦铁骑勇猛冲杀,仇池军大败,损兵折将一万七千余。杨定战死。仇池尽失陇西、上邽之地。

杨定无子,其叔佛狗之子杨盛即位。他采取联南制北的策略,亲附晋室,对抗西秦。到杨盛子杨玄、杨难当在位时,仇池曾先后攻占上邽、宕昌、赤水(在岷县东北)等地,势力伸展到洮水上游。这段时期由于北方后秦、西秦等政权相继呈衰败之势,仇池地区出现了一段和平安定的时期,四方流民纷纷前来归依,“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之”(《魏书·氐传》),大批士民投奔仇池,增强了仇池政权的实力。

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杨玄死,弟杨难当废杨玄子杨保宗自立。不久,仇池发生严重饥荒,杨难当乘机发动军队南攻汉中、葭萌(今四川省广元昭化镇)。元嘉十八年(441年),杨难当再次率主力攻拔葭萌,进围成都门户涪城(今四川省绵阳)。强攻十余日未能破城,只好徙流民七千余家返回仇池。次

年,宋军大举反攻仇池,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等率军取道汉中,长驱直入,连克武兴(今陕西略阳县)、下辨、白水(今陕西略阳白水江镇),在洮水城(在今成县东北)击败仇池军主力。丞相杨万寿、将军姚宪等各率部曲降宋。杨难当逃往北魏控制下的上邽后又偕妻投奔太武帝,后死于洛阳。杨难当次子杨虎守阴平,逃至下辨被宋军俘虏,解往建康后处死。后仇池国亡,前后延续59年。在陇南相继建立的几个氏族政权中,势力最为强盛的还算后仇池国,国土东至汉中,南接广元,北达天水,西界宕昌。

在后仇池国灭亡的第二年,北魏出兵击败宋守将胡崇之。武都氏人乘机拥立杨难当的侄子杨文德为仇池公,聚合武都、天水、汉阳、武阶、仇池五郡氐众附宋抗魏。宋封杨文德为武都王,以葭芦(今武都县外纳乡)为都,建国,史称武都国。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北魏将皮豹子率军进攻杨文德。杨文德战败逃亡汉中,因失守罪被宋免官削爵,居建康。皮豹子设武都镇至白龙江边之仙陵山抵龙岗(今武都区城关旧城山)。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文帝刘义隆兴兵大举北伐,起用杨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攻陇南,收复阴平、平武、葭芦等地,一时声震关陇。不久,宋刘义宣反叛,杨文德不从,被执送荆州杀害。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杨保宗子杨元 and 和为征虏将军,继杨氏正统,被立为武都王,治白水(今武都县龙坝乡秦家河)。因杨元 and 年幼才弱,



宋又任其叔杨头为假节，管理仇池事务。杨元和不久便逃奔北魏，其从弟杨僧嗣复立，自称武都王，还保葭芦。当时，刘宋王朝内乱，益、宁二州刺史萧惠开叛宋，为杨僧嗣阻击，刘宋遂以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后又进号为征西将军。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十月，杨僧嗣卒于葭芦。杨文德弟杨文度自立为武都王，遣使降魏。魏以其为武兴镇将，刘宋封其为武都王、北秦州刺史。元徽四年（476年），杨文度遣弟杨文弘北进，攻取兰皋（今康县大南峪），次年十月又攻陷仇池。魏派征西将军皮欢喜、梁丑奴及平西将军杨灵珍率众四万反攻杨文弘，军至建安（今西和县西峪坪），文弘弃城退走。魏军夺回仇池后，又乘胜攻占葭芦，杀杨文度。武都国灭亡，立国共30年。

武都国灭亡后，在陇南同时建立起了两个氏族政权，一个叫“武兴国”，一个叫“阴平国”。

杨文度死后，其弟杨文弘退守武兴（今陕西省略阳县）。宋顺帝昇明二年（478年），自立为武都王，先附宋后投魏。史家称其政权为武兴国，这个政权的疆域远远小于仇池国，强盛时据有今陕西略阳、康县、徽县、凤县等地。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九月，杨文弘死，魏以文弘兄子杨后起为武都王，以文弘子杨集始为白水太守。不久，杨集始自立为王，被杨后起击败。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年）正月，杨后起死，齐王朝以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年），杨集始入武兴，以城降

北魏。不久，魏将元英攻齐汉中，围南郑。齐令杨后起侄杨元秀还镇仇池，率氏兵断魏道路，破魏历城、兰皋、骆谷、仇池、平洛、苏勒六成。元英遣仇池公杨灵珍南进至泥功山（在今成县西）。杨集始遣弟集朗率军迎战杨灵珍，不胜，退走下辨。

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北魏南梁州刺史杨灵珍率部降齐，攻武兴，杀杨集始的弟弟集同、集众。齐灭后，杨集始又受封于梁。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十一月，杨集始卒，魏立其子杨绍先为南梁州刺史、武兴王。天监五年（506年），魏攻克武兴，俘杨绍先，改其地为东益州。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杨绍先乘魏内乱，进攻武兴，不久病死。其子杨避邪为东益州刺史。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杨避邪起兵反魏，西魏派叱罗协和赵旭率兵讨伐，进兵汉中，攻占武兴。杨避邪弃城逃亡，被叱罗协追获后斩杀。武兴政权遂亡。武兴国传四代四主，前后历81年。

在武都国为北魏所灭时，仇池氏族另一宗室杨广香在北魏支持下，占据阴平和四川平武一带。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在北魏灭武都国、追杀杨文度的过程中，杨难当族兄弟杨广香有功于北魏，被封为阴平公、葭芦戍主，建立起与武兴国相对抗的政权，史称其为阴平国。阴平国东北与武兴国接界，西与邓至、宕昌相邻，南为昭化，相当于今四川平武、青川、昭化和甘肃文县、武都县、康县的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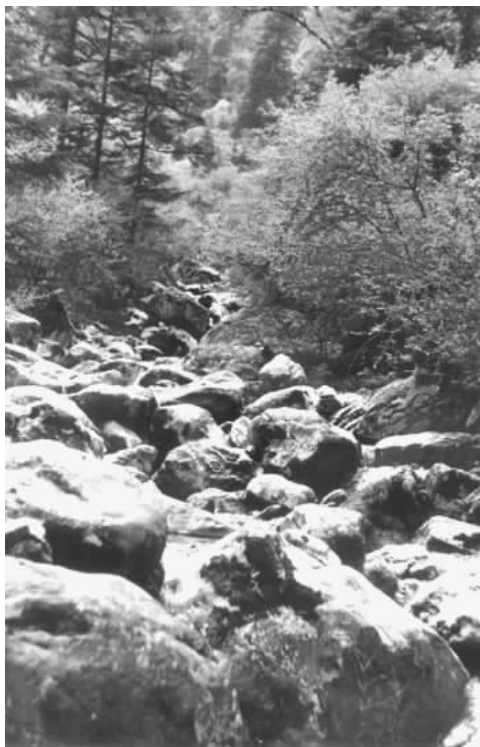
同武兴国一样，由于势力弱小，而

且介于南、北强国之间，阴平国一直采取左右逢源的政策，时而投南，时而附北，以求得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梁元帝承圣二年（553年），阴平王杨法深与族人杨崇集、杨陈佺相互攻击。西魏成州刺史赵昶遣使调解，乃分其部落，置州郡处之。至此，阴平政权瓦解，但王族势力仍存，仍控制着阴平国旧地。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年）八月，阴平氏帅杨永安发动利、兴、武、文、沙、龙六州氏族响应益州总管王谦反北周，遭北周大将军达奚长儒镇压。至此，阴平国王族势力终被平定，史书再无其活动记载。阴平国共传八代八主，历时102年。

在杨氏氏族建立政权、称雄仇池的同时，在今陇南西北部还存在着一个梁姓羌族建立的宕昌国。

宕昌国建立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其国都设在今宕昌县城关。根据《北史·宕昌传》记载：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十二月，宕昌王梁弥忽派其子梁弥黄奉表向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请求内附，太武帝许之，并遣使拜梁弥忽为宕昌王，赐梁弥黄为甘松侯。宕昌国始为北魏政权所承认。此后，一直向北魏贡献方物（地方特产）。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宕昌国又与南朝刘宋建立联系。刘宋封梁瑾葱为河州刺史、宕昌王。宕昌又遣使向刘宋奉献方物。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北魏将皮欢喜攻占仇池，宕昌王梁弥机曾遣其二兄率众攻击杨文度，被封为征南大将军、河南公、宕昌王等。后又受封于南

齐。太和九年（485年），梁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逃奔仇池。魏仇池镇将穆亮以梁弥博为人凶悖、部众不服为由，上表请立梁弥机侄儿梁弥承为宕昌王，并率军至龙鹄（今四川九寨沟县），击走吐谷浑。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宕昌王梁仙定举兵反魏。魏秦州刺史独孤信率兵讨伐，军未至而梁仙定为其部下所杀。独孤信在三交谷口击败梁仙定余部，其子梁弥定继为宕昌王。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宕昌羌豪獠甘发动变乱，攻袭弥定。弥定奔往西魏，獠甘自立为宕昌王。不久，弥定在西魏



宕昌大河坝风光



支持下反攻,攻杀獠甘。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宕昌羌反北周,进攻石门戍(今武都县石门)。北周洮州总管李贤率千骑进攻,斩获数百人。宕昌羌又引吐谷浑数千骑。李贤设伏兵于隘路大破之。次年,北周诏令大将军田弘进攻宕昌,获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寨,于其地设宕州,辖宕昌郡(治今宕昌县南阳)、甘松郡(治今舟曲县峰迭)。宕昌国灭亡,共传九代十二主,历时140余年。

宕昌国国力比较弱小,国土“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藉)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大致相当于今宕昌县及岷县、舟曲县的部分地区。宕昌羌族政权的经济比较落后,但在与中原大国的频繁交往中,他们积极学习,吸收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岷江及白龙江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诗圣杜甫 陇南行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安禄山带领军队十五万人,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迅速渡过黄河,攻占了洛阳、长安等地,由此爆发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关中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此时地处西陲的陇南,虽然受到来自西面吐蕃族的威胁,但暂时还呈现出一派平和景象,成为中

原逃难者的避难之地。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这些避难者中的一员。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早年漫游吴越、齐鲁之地,写下了大量的诗作,后在长安做过小官。安史之乱中,他一度被俘,脱险后任唐肃宗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秋,在他48岁时,因仕途坎坷,加之生计艰难,便辞职携眷西行,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三个月后,移居同谷。年底,又为生活所迫,启程前往成都,定居于成都浣花溪草堂。因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晚年漂泊于湘鄂一带,59岁时,死于湘江上的一艘小舟之中。

杜甫在陇南生活的一个多月中,以经行前后为序,将他所到之处的山川风貌一一记入诗中,写下了《法镜寺》《龙门镇》《凤凰台》《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等二十多首诗,其中以《同谷七歌》最为有名。凭借着伟大诗人杜甫的光辉诗篇,陇南,这块祖国西部神奇的土地,遂以其雄奇而又秀丽的风姿为世人所注目。

杜甫在秦州前后共住了三个月,天气渐冷,饥寒交迫,吐蕃的威胁也愈来愈紧。“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正当诗人忧愁之际,忽有同谷的友人来信,说同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川秀美,邀请诗人前去做客。杜甫欣喜异常,当即决定离开秦州到同谷去。在十月底的一个夜晚,杜甫雇了一辆马车,携同家眷,踏上了赴同谷的路程。

杜甫从秦州出发后，取道赤谷（今天水西南暖和湾），开始了赴同谷的长途跋涉。临行前，杜甫根据他对同谷的了解，写了《发秦州》一诗。他在诗中写道：“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在诗人的心目中，同谷是一块富足的“桃花源”，在那里有食、有衣、有友人，可作为栖息之地。

从秦州赴同谷的旅途中，诗人一共写下了十二首纪行诗，这些诗基本上都以地名为题，描写一路景物，描绘了陇南的秀丽山川，并借景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

诗人一出秦州，就感受到了旅途的艰难。他在《赤谷》诗中写道：“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出赤谷南下，经今天水市平南乡，就到达铁堂峡。铁堂峡，位于铁堂山下，在今天水市西南七十余里的天水镇东北方向张家峡与赵家磨之间。这里的道路更加艰险，“威

迟哀壑底，徙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出铁堂峡向西，就到达了盐井。盐井即今礼县盐关镇。这里很早就盛产卤盐，三国时称卤城。诸葛亮六出祁山时，曾在这里与曹魏军激战多次。隋唐以后成为陇右主要产盐地，有盐井多口，供给秦、阶、成诸州。诗人在这里见到辛苦劳作的盐工，耳闻目睹了官家的重利盘剥，愤怒地写下了《盐井》诗：“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桴桴，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从盐井出发，诗人折向西南进入寒峡。寒峡，古书又写为塞峡，即今西和县长道镇境内的大晚家峡。由此再南行，经过法镜寺（在今西和县北石堡乡境内），然后翻越今元号山东麓后，进入龙门河谷（今西和县南石峡河），穿青阳峡



礼县盐关盐神庙



(今西和县十里乡内),过石龕(在今西和县石峡乡西北八峰山腰)到达龙门镇。

龙门镇,在今西和县石峡乡境内(一说在成县府城),石峡河穿境而过。石峡河古称龙门水,北魏时曾在这里设龙门戍。这里四面环山,山势陡峭,峡口狭窄,宛如石门,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不但北魏在此建有戍所,而且唐代也以此为军事重镇,驻有大量戍卒。杜甫在这里写了《龙门镇》一诗,诗中写道:“旌竿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

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驻军的军旗在冬日沉沉的暮色中显得十分暗淡,戍卒手中的兵器也由于冷风寒霜的侵蚀,显得钝涩了。军威不振,士气低落。对此,诗人十分感慨。

诗人在龙门镇住一宿,次日又继续南行,经过积草岭(今西和县、成县交界处)、泥功山(今成县境内),到达了这次旅行的终点同谷县。

杜甫来到同谷,满以为境遇会得到改变,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也许是邀请他来的“佳主人”另就他职远离同谷了,也许是诗人携妻带子、穷困潦倒的状况使势利的“佳主人”避而不见了,总之,诗人在同谷的处境比秦州更加困难了。天寒地冻,人地生疏,有时甚至绝粮断炊,诗人生计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诗人不得不跟随养猴的老人到深山老林拾橡栗、挖黄独来度日。诗人在同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困苦的一个月。在这里,他亲身体验到了下层劳动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在凄风苦雨中,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把对远在他乡弟妹的思念,对国家时局的关注,对昏庸腐朽的统治者的谴责集中起来,创作了千古绝唱《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世人又简称为《同谷七歌》。

杜甫的《同谷七歌》是诗人生活濒于死亡边缘的凄惨哀号和愤怒抗议,是向黑暗社会痛断肝肠的血泪控诉。在杜甫的所有诗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全诗分七个自然段,五十余句,三百多字,感情凄怆,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一唱三



徽县青泥河

叹,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激动不已。这组长诗用歌行体的形式,酣畅淋漓地倾吐了诗人三年来辗转流离、郁郁不乐的怨愤,如泣如诉,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受到历代文人骚客的推崇。宋代文学家朱熹评论说:“同谷七歌豪宕奇崛,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诸调而变化出之,遂成创体。”李师存在《师存记闻》中也说:“太白远别离,蜀道难子美,寓同谷七歌,皆风骚极致,不在屈、宋之下。”

杜甫在同谷寓居期间,还到过同谷县的凤凰台、飞龙潭等地。在这里,诗人听到了关于凤凰的传说,看到了凤凰山的险峻和山下万丈潭的壮丽景观,感慨万千,写成了《凤凰台》《万丈潭》两首诗。

诗人在同谷只住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因生活所迫,决定离开同谷入蜀,希望在那里能够得到朋友的帮助。

这年十二月一日,杜甫又带全家踏上了前往成都的旅途。旅途中,诗人也写了一组十二首以地名为题的纪行诗,其中有四首诗描写的景物仍在陇南境内,依次为《发同谷县》《木皮山》《白沙渡》《水会渡》。另外,还有一首《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

在《发同谷县》中,诗人解释了他离开同谷的原因:“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虽然生活艰苦,但对同谷的秀丽景色仍十分流连,对这里的老百姓也十分依恋,“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

登上同谷县东南二十余里的木皮岭,杜甫仍然回首眺望同谷,“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凤凰村,在同谷县的凤凰台下。栗亭,即今徽县栗川乡东南。杜甫自同谷出发,从栗亭西边经过,翻过木皮岭后,又越过青泥岭(今徽县东南),进入嘉陵江河谷。

诗人在渡过白沙渡(今徽县东南)、水会渡(今陕西省略阳县西北)后,越飞仙阁,过天险剑门关,终于到达成都。

诗人在渡嘉陵江时,想起了患难之交吴郁。他知道,吴郁是两当人,故乡在距渡口百里之遥的嘉陵江上游(据考,吴郁故乡在今两当县西坡乡三渡水村)。此时,吴郁已被唐肃宗贬往长沙。诗人感慨万千,他想到,此时位于嘉陵江岸旁的吴郁旧宅,必定是人去宅空,蛛网封门,一派凄惨景象。“寒城朝烟澹,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鸱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怀着对友人的思念,他又回顾了当年在长安时与好友吴郁的密切交往,检讨了自己未能为吴郁辩解冤屈的过失,挥笔写就了《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诗,以表达对朋友的怀念之情。

据地方志记载,杜甫在经行栗亭时还曾留有题记,但到唐懿宗时已不复存在了。当时任职成州刺史的赵鸿曾亲自勘寻。“杜甫栗亭诗,时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何所有。”杜甫在栗亭写的诗,当地人还能吟诵一些,但题记却找不到了。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连当时人们所吟诵的一些诗,也失之不传了。

杜甫在陇南前后度过一个多月的



时间,作诗二十余首。尤其是那刻画入微的纪行诗,那慷慨激昂的抒怀诗,在杜甫一生诗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杜甫研究专家在《杜诗笺注》中评论道:“杜公纪行诗,从《发秦州》至《万丈潭》,从《发同谷》至《成都府》,入天穿云,万壑千崖,雨雾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娱可忆之状,触目惊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诸掌上。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大凡读过杜甫陇南纪行诗的人,都会对陇南雄奇而又秀丽的景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吴氏兄弟 抗金兵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矛头直指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在人民抗金斗争的热潮推动下,南宋军官中也涌现出一批抗金英雄人物。当时,在中原东部率领爱国军民英勇抗击金兵的著名将领有岳飞、韩世忠,在西北,领导军民同金兵展开殊死斗争的则是吴玠、吴玠兄弟。

吴玠(1093年—1139年),字晋卿。吴玠(1102年—1167年),字唐卿。祖籍德顺军陇干(今甘肃省静宁县),后迁水洛城(今甘肃省庄浪县)。他们自幼生长在干戈纷扰的边界地区,习知戎马战射,有立功报国的雄心壮志。在抗金斗争中,他们与韩世忠、岳飞等分兵抗击,独当一面,在陕、甘、川边境地区与金兵

苦战近四十年,战功累累,固守了南宋政权的西部防线。他们与岳飞、韩世忠等一样,都是彪炳史册的抗金英雄。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冬,金兵分三路南下,由洛索、萨里干率领的西路军,直入“秦川之地”,企图占据陇右,打开入蜀大门,然后顺江东下,消灭东南的赵宋政权。金兵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地,宋将不逃则降,无敢与抗者。不久,今河南陕县、陕西华县及甘肃天水以北之地大都为金兵攻取。后在各地“义兵”连续不断的抵抗下,金兵无力南进,被迫撤兵东还。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调集四十万大军,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县)与金兵展开决战。由于盲目轻敌,处置失当,结果宋军大败,“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金兵占领了几乎整个陕西和甘肃东部地区。宋军各路将帅纷纷后撤。张浚退至阆州(今四川省阆中县),关师古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今岷县东、礼县西),孙渥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吴玠、吴玠也带领数千名散卒,退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大散关以东),后又屯兵徽州、成州、凤州一带。

富平之战失败后,“朝问隔绝,人无固志”,有人甚至想劫持吴氏兄弟去投降金人。但吴玠、吴玠兄弟临危不惧,他们召集诸将,歃血盟誓,勉励大家忠义报国。在他们的感召下,将士们纷纷表示,愿在他们兄弟的率领下,出生入死,为国效力。在安定军心的基础上,吴氏兄弟积极联系民众,争取到人民群众的

大力支援。在屯驻和尚原时,军中乏粮,百姓便自动约集起来给他们送粮。金兵发现后在渭河沿岸伏兵截杀,又在村落中设保伍连坐法,但百姓仍然冲破封锁,冒死为他们运送粮食。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退驻仙人关(今徽县虞关)后,由于大军云集,粮食供应困难。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吴玠又组织军队屯田,先后在阶(今武都区)、成(今成县)、西和(今西和县)、天水(今天水秦城区)、沔(今陕西勉县)、凤(今陕西凤县)、梁(今陕西汉中)、洋(今陕西洋县)、利(今四川广元)九州置屯田六十余庄,耕田八百五十多顷,每年收获二十万石粮食,得到朝廷的表彰,并将其屯田经验推广到南宋统治区各地。

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春,金兵大举南攻。吴玠受命担任陕西诸路都统制,负责固守阶、成、岷、凤、洮五州及凤翔和尚原一线防务。金兵进军迅速,至三月十八日,攻破阶州,向兴州(陕西略阳)进兵。关陇六路地皆为金人占有。四月,阶州统领杜肇收复阶州。五月,金军分两路夹击和尚原,均被宋兵击败。十月,金军大将兀术(完颜宗弼)会诸路兵十余万人,造浮桥,跨渭水,再次向和尚原发起大规模进攻,志在必得。和尚原是从关中翻越秦岭进入汉中的重要关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面对强敌压境,吴氏兄弟与士兵同甘共苦,依靠当地百姓支援,誓死保卫和尚原。在战斗中,他们采用强弓迭射、奇兵邀击、断敌粮道、纵兵夜袭的战术,激战三昼夜,终于大获全胜。金兵战败后狼狈逃窜。这

次战役,杀死金军将士上万,生俘金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六十人,缴获无数,连兀术本人也被射中两箭,差一点当了俘虏。这是他入侵中原以来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吴玠在这次战役后因功被提升为镇西军节度使,吴玠升为康州团练使、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

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十一月,兀术乘天降大雪之际潜兵于高山丛灌间,乘宋军不备,突袭和尚原。宋军溃败,吴玠退至河池与金军相持。十二月,金将张中孚攻破阶、成二州。金军陕西经略使萨里干(又写作撒离曷)则从商州直捣上津(今湖北郧西县西北),对宋军形成夹击之势。次年正月,萨里干攻取金州(今陕西安康)并长驱直入洋(今陕西洋县)、汉(今陕西汉中)等州,进逼饶风关。驻守兴元的刘子羽急召吴玠来援。吴玠提兵从河池(今徽县)出发,一昼夜赶了三百里路程,到达饶风关。为了挫敌锐气,吴玠派人将一批黄柑送到金营,说:“大军远道而来,聊以解渴。”萨里干见了大吃一惊,以杖击地说:“他怎来得这样快!”双方在饶风关前激战六昼夜,金兵死者堆积如山。后因一降金小将领兵从小路偷袭宋军,饶风关始丢失,金兵攻入兴元(今陕西汉中)后一无所得,只得撤退。在撤退时,吴玠又伏兵于武休关,金兵遭袭击后堕涧死者以千计,輜重全部丢弃。

饶风关战后,宋朝重新布置了川陕防务:吴玠屯仙人关,负责自秦(今天水)、凤至洋州防务;刘琦屯巴西(今四川绵阳),负责文(今文县)、龙(今四川



平武县东)至威(今四川汶川县西北)、茂(今四川茂汶县)一带防务;关师古屯武都,负责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至阶、成等州防务。并加强战备,防御金兵再次南下。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正月,金兵开始南攻,一部侵入宕昌、临江寨及花石峡。关师古遣刘戡领军拒之。二月,兀术、萨里干和伪齐刘豫率领十万骑兵攻取两当县后,从铁山(今徽县东南)凿山开道,循岭东侵。此时,吴玠屯兵仙人关,吴玠驻防于七防关(今康县云台镇大山岔)。吴玠得知金兵进犯,急忙率军

迎战,在仙人关东三里处筑城垒,起名杀金坪(又名胜金坪),设置关隘两道。吴玠远道来援,沿途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吴玠军队会合。双方参战的兵力十分悬殊,金兵达十万,而宋军仅三万。二月下旬,金兵直赴杀金坪,双方开始交战。金兵进攻异常猛烈,但屡屡受挫。兀术首先进攻吴玠大营,被吴玠用神臂弓和炮石击退。兀术恼羞成怒,又以云梯攀登,被宋军用撞竿击倒云梯。吴玠见战事紧张,以刀砍地,激励将士说:“死就死在这里,敢退者斩!”他身先士卒,手拿长矛刺敌,大大鼓舞了士气。

宋军越战越勇。金兵久攻不下,便分兵为二,东、西两面夹击仙人关。宋军兵力不足,疲于奔命,便放弃了第一道防线,收缩兵力,退守第二隘。金兵步步紧逼,人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督军死战,矢如雨下。金兵死者层层相叠,几与城齐,还是踩着尸体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最后,吴玠乘金兵疲劳无备之际派杨政、田晟另率一支精兵,突然杀入敌阵,用长刀大斧左右砍击敌人。当晚,又在四面山上燃起大火,擂鼓助威。次日拂晓,吴玠又派王喜、王武冲入敌营。金兵屡受打击,仓惶逃窜,溃不成军。至此,兀术眼见大势已去,也夺路而逃了。接着,吴玠又遣制统王俊伏兵于河池,扼敌归路,再次大败金兵。

在仙人关战役前,金兵将领自元帅以下都携眷而来,决意要攻占仙人关,打通入蜀道路,入驻四川,然后东下灭宋。在遭到惨败之后,才感觉到吴氏兄



徽县吴山

弟难以对付，只好退守凤翔，数年间不敢轻举妄动。吴玠乘机收复了凤、陇二州，又一次成功地保卫了秦陇和川陕地区。吴玠因功升为奉宁、保静军两镇节度使，后又晋升为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也被提升为定国军承宣使。

仙人关大捷，宋军以少胜多，名传千古。后人张伯魁曾作《胜金坪》诗一首：“此地人称古战场，吴家坪上望苍苍。凿山开道金兵北，宋廷偏安仗二王。”至今，仙人关还有六米长、二米高的石城垒和安公生祠祀断碑残存。当地群众称为“吴王城”。

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吴玠遣吴玠、杨政攻取伪齐所占秦州，俘守将胡宣。金元帅萨里干来援，吴玠遣川陕宣抚后军中郎将、阶州人牛皓前往阻击。两军遇于瓦吾谷，牛皓以不满二百人兵力，下马死战，全部阵亡。金人十分佩服，称赞说：“真健儿也。”

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宋金和议初成，吴玠、岳飞等以功高名著，被封为“进开府仪同三司”。吴玠迁为四川宣抚使。六月，病逝于仙人关营所，年仅47岁。死后原准备归葬故乡。但八月金人失盟，次年四月又大举入犯，因此，吴玠葬于河池(即今徽县城关)东北隅的钟鼓楼山上，当地百姓称其为吴山，今墓葬与墓碑仍存。为了褒奖他的保蜀抗金大功，“谥武安，作庙于仙人关”。孝宗时追封为涪王。据史载，当宋高宗听到吴玠病逝的奏报后，十分悲痛，罢朝三日，以示悼念，并给其家属赐钱三万。

吴玠死后，领导川陕军民抗金的重

任便落到了吴玠的肩上，他继承其兄遗志，坚持抗金斗争，继续为抗金保蜀作出贡献。

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金朝内部发生政变，侵宋最凶的兀术取代挾懒掌权。五月初，兀术撕毁和议盟约，倾国中之兵大阅于祁州(治今河北省安国县)元帅府，分四路南下，企图一举灭宋。萨里干领兵西进，一路渡黄河，入长安，趋凤翔，沿途州县皆降于金。当时，南宋陕右诸军隔在敌后，惟有熙河经略使兼宣抚司参谋官孙渥与秦凤路经略使吴玠随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屯兵河池。胡世将猝临大敌，手足无措，急召诸将商讨对策。孙渥建议放弃河池，移兵于仙人关(今徽县虞关)，据险自保。吴玠拍案而起，说：“出此懦语沮军，可斩也！”并说：“请以百口保破敌！”意思是愿以吴家百口人头作保，允许他领兵破敌。胡世将深受感动，也指着座帐说：“世将誓死于此矣！”于是，制定了详细的抗敌作战计划。六月，吴玠向萨里干约战。萨里干遣古延以三千骑兵直冲宋营，被宋将李师颜打败，退入扶风。李师颜乘胜追击，攻克扶风，俘金兵一百余人。萨里干见势不妙，亲率大军前来决战，在百里坊一带被宋将姚忠击败。这一胜利，不但坚守住了河池、仙人关等军事要地，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刘琦、韩世忠等东路诸镇的军事行动，也为中路岳飞部的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吴玠升迁为镇西节度使。

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金统军胡珊、迪布禄合军五万屯于



陇州(今陇西陇县)的刘家圈,企图伺机南犯。吴璘在仙人关一带集合大军与敌相持。吴璘认为,应乘敌不备主动进攻,以攻为守。于是,他向胡世将请兵:誓若不捷,誓以必死。”胡世将给他二万八千军队。吴璘检阅了用新法训练的军队,然后取道秦州,直赴刘家圈,出奇兵向金兵发起突然袭击。金兵仓促应战,大败而逃。这一仗,宋军杀敌数千,生俘万余人。胡世将在向朝廷上报的状文中说:“川陕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胜。”

吴璘在长期的操劳中身染重病,每天吃丹砂数十粒。然而大敌当前,他置个人疾患于不顾,仍披挂上阵,领兵杀敌。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主完颜亮背盟毁约,发动六十万大军,亲自率军南来。他遣合喜为西元帅,扼守大散关,进攻黄牛堡。吴璘以重病之身,坐着轿子从河池赶往杀金坪,亲自布置抗金防务。随后指挥军队收复秦、陇、熙、河等十三州,驻军德顺州(今静宁县),同金兵相抗。正当宋军节节胜利之时,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主动向金求和,以大散关为界,岷、阶、成、凤等地仍为宋地。吴璘退兵返回河池,返回途中,遭到金兵袭击,三万精兵,仅余七千,所得之地悉被金人抢占。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五月,吴璘在悲愤交加中死去,被追封为信王,谥“武顺”。

吴璘死后,其子吴玠被任为兴州都统,负责阶、成、文、兴、凤州等地防务达二十年之久,最后病死于成州。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十月,匾宁宗亲书“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匾额,国子祭酒高

文虎奉旨撰文,朝奉大夫、起居舍人陈宗召奉旨书文,立碑于成州北吴玠墓前(在今成县城关石碑寨村)。石碑仍存,碑文八千余字,详细记述了吴玠生平事迹。

吴氏兄弟的抗金斗争,在宋金战争的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吴玠、吴璘和吴玠以河池为屯军基地,充分利用这里丰饶的物产、险要的地势,坚持抗金斗争达六十余年,通过大小数十次战役,不仅有力地拒金兵于蜀口之外,扭转了宋军几近溃败的被动局面,而且大量地消灭了金朝的精锐兵力,粉碎了金朝统治者得陇望蜀的梦想及进而东下覆灭南宋王朝的进军计划,保护了川蜀和南宋朝廷。“绍兴和议”之后,宋金西部疆域之所以能够以大散关为界,吴氏兄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吴玠、吴璘以及吴玠在屯守河池期间,陇南人民在物资上和人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援,作出了巨大牺牲,从而保证了宋军攻必克,战必胜。陇南人民的支援,是吴氏兄弟取得抗金胜利的重要原因。



明清风云

正当宋、金鏖战之际,在中国的北方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蒙古汗国。1206年,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完成了对蒙古草原各部落的统一,宣布即蒙古大汗

位，号称成吉思汗。自此以后，挥兵南下，于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整个北方为蒙古军所占据。

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十一月，蒙古军破武休关，攻仙人关。宋御前中军统制张宣与蒙古军战于青野原（今徽县东南），宋军战败。蒙古军入凤州，略河池，进抵成州。知天水军曹友闻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出战。蒙古军焚掠后退去。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军再次南下，围攻西和州者达十万人。宋各路救兵观望不前。西和州知州陈寅督促守城军民力战良久，仍不能解围。城将破时，陈寅对其妻杜氏说：“你赶快乘乱突围逃走！”其妻拒绝逃走。妻子自杀后，他的两个儿子和媳妇也同时自杀于母亲尸体旁，以示对国家的忠诚。陈寅将其殁而焚之，随后身穿朝服登上战楼，面对南宋朝廷方向而拜：“臣始谋守此城，为蜀藩篱，城之不存，臣死份也。臣不负国！臣不负国！”然后拔剑自杀。宾客同死者二十八人。他的另一个儿子随后赶到，也要自杀。军士们阻拦道：“不可使忠臣无后！”用绳将其缢于城下，不料也摔断脚骨而死。陈寅父子可谓一门忠烈。

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率大军再次南下，自大散关入川时，另派按竺迺率军西掠，相继攻破阶州、宕州和文州等城，阶、岷、迭、宕番族十八族也献地投降，陇南各州县遂置于蒙古政权统治之下。在元朝统治陇南的一百三十多年时间里，以按

竺迺后裔赵世延为首的蒙古贵族采取武力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政局基本稳定，境内很少发生战事。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大将徐达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北走，元朝灭亡。次年，徐达乘胜西进，连克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宁远（今武山县）、巩昌（今陇西县）。元将李思齐以洮、岷之地降明。陇南西和、礼县、成县、徽县、两当等地遂归附明朝。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决定伐蜀，以完成统一大业。以颖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副之，率步骑由秦、陇等地南征。临行前，朱元璋对傅友德说：“蜀人闻我西伐，必悉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师。若出其不意，直指阶、文，门户既坠，腹心自溃。兵贵神速，患不勇耳。”四月，傅友德进抵阶州，击败蜀守将丁世贞，克阶州城。蜀军撤退时毁断白龙江桥。傅友德修复渡桥，克五里关（今文县北），遂拔文州。又渡白水江，进军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当时，正值嘉陵江涨水季节，明军不得渡，便削木牌数千，上书攻克阶州、文州、绵州的情况，投入江中，顺水漂下，以图瓦解敌军。沿江蜀军见到木牌，知道明军已抄其后背，遂不战而溃。

陇南地区自唐“安史之乱”后没入吐蕃，至元末明初傅友德取道攻蜀，战火连绵达六百余年，人口减少，经济凋敝，城池残破。明初，除阶州降州为县外，文州、徽州也曾一度降州为县。

在明王朝统治的数百年间，陇南境内虽无大的战事，但少数民族的反抗和



汉族农民起义却此起彼伏。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千户张者发动阶、文二州驻军叛乱。平羌将军宁正率兵平定,叛乱军士全部被调往浙江海门戍守。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七月,四川农民起义军在蓝廷瑞率领下北上,在陇南境内与明军激战,相继攻破徽州、成州,两城大部被焚毁。次年,蓝廷瑞又声言北进。明将李璋急驰徽州,分兵五营,列戍白水江镇,首尾连络,又多设疑兵于险要之地。起义军连克江油、昭化,至白水江边,见明军有备,始退军。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居住在今舟曲县铁坝、拱坝一带的番族自今武都县两水黄鹿坝沟东出。洮、岷兵备道及宕昌土司马应龙联合进剿,番兵战败退军。

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番族首领叱力砸率部进攻阶州。明河州参将陈堂战败逃走,洮州守备朱宪、史经战死,阶州守备花延武被俘后杀死。次年三月,明军全力进剿,由于力量众寡悬殊,番族战败,叱力砸被杀。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阶州驻军兵卒周大旺等发动兵变,与陕西白水王二、府谷王嘉胤、汉南大梁王等农民起义军相呼应,共同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第二年,阶州起义被明军镇压,周大旺被杀。当时,秋禾方熟,官兵军纪不整,纵马践踏农田。阶州知州耿应烈率士民数百号哭于辕门。

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李自成起义军部将过天星、混天星、一斗谷、老回

回、摇天动等部西进陇南,转战两当、徽县等地。七月下旬,攻占成县县城,击杀秦州卫将领张应举于城东门楼,擒典史孙如球于营中,在石碑、张旗两寨布防。八月,移军至泥阳。随后进入西和、礼县、阶州、文县,先后杀死两当知县车胤贤、文县守备张外勋、西和知县耿桂芳等明朝官吏。

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李自成亲率过天星所部五万余人,从庆州(今庆阳)南入汉中,与高迎祥余部会合,攻破汉中大部分州县。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领兵自徽州东向。李自成率部折向阶州、成州。四月十五日,明副总兵曹变蛟与起义军在阶州郭家坝相遇,双方展开激战,各有死伤,后官兵因粮尽撤退。九月,起义军攻陷阶州城,州署公廨悉被烧毁。曹变蛟与总兵左光先被解职。起义军分兵两路,一路北出西和、礼县,一路仍转战于徽、成、两当、凤县间。李自成率部入川。第二年正月,李自成联军数十万,又自川北进入陇南,集结于文县、阶州一带。二月,一部分起义军经西和、礼县,北向庆阳、固原;一部分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直指岷、洮、巩昌,越长城至羌中,以补充战马。洪承畴率曹变蛟、左光先等,一路紧追不舍,双方连战二十七昼夜。三月,李自成自羌中返还临洮,屯驻于洮河一带。四月,李自成强渡洮河,自宁远(今武山)南入西和、礼县,再南越成、阶,东向略阳(今陕西略阳县)。不久,进入河南,农民军势力得到迅速发展。李自成起义军在困难时期,先后在明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陇南

山区转战五年之久,使起义军得到休养和补充。

据传李自成过阶州时,因长途跋涉,士兵久战不息,十分疲惫,不少人患上了眼疾。为消病祛疾,李自成亲至城隍庙祷告,并亲书“立见报施”匾额一方,悬于城隍庙门之上。该匾于1957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克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此时,陇右、兰州、河西等地悉归农民军,但陇南各州县仍为明军所据。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相继退出北京、西安,南走高州。清军尾追南下,“秦属各县,攻下者四城,降者三十八城”。陇南各州县全部降清。

清王朝统治陇南伊始,明朝余部以及张献忠起义军、吴三桂势力对陇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直到清王朝灭亡,陇南境内风云激荡,干戈不止。

陇南各州县俱降清军,但明军残余势力仍很强大。他们据险固守,联络势力,伺机而动。就在清军在陇南建立统治的第二年,即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原明朝固原副将武大定就以仇池山为基地,举起了反清旗帜。明军在阶州、徽州等地余部纷纷起兵响应。清王朝急忙派贝子满达海、辅国公哈尔楚浑率大军围攻仇池山。据说因仇池山险峻,清兵久攻不下,满达海便施出一计,利用夜间,驱赶群羊上山,羊角上挂有灯笼。明军以为清军来袭,急急迎战,

反复多次后放松警惕。清军偷袭成功,武大定部将石国玺投降,仇池山失守。武大定部将高如励、蒋登雷率所部退据三台山。满达海等掘壕重围,蒋登雷率二千余人降清。清军遂克三台山。之后,散居阶州、徽州等地的武大定余部也被清军各个击破。

顺治五年(1648年),据守四川的张献忠部多次北上,进攻徽州。六月中旬,张献忠部数千人在伏家镇大败清军,杀死游击台清阿等军官十七人,官兵死亡达千余人。至八月,起义军始撤出徽州。

乘张献忠部屡屡北进之际,盘踞在四川北部的残明势力也频频发起反攻。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明将赵荣贵派兵攻陷文县,占据西城。清军参将吴应科、杨相等合兵攻击,明军遂乘夜撤走。是年冬,又攻文县,清军布防于下丹堡,明军见清军有备,遂退回。

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明宗室朱森溢自号“秦王”,率其将赵荣贵领兵万余人由文县玉垒关北攻阶州。初五日进至城下,将阶州城围困。清守军十分恐慌。吴三桂由汉中遣定西将军李国翰率援兵西进,阳平关参将许台魁道出碧口袭击其后,临、巩总兵王允领兵南下夹攻明军,在阶州城下激战数日。明军失败,朱森溢、赵荣贵全部战死。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反叛于云南。吴三桂侄儿、四川总兵吴之茂举兵响应。盘踞汉中的明朝旧将贺珍以及屯守徽、阶诸州的武大定、石国玺也遥相呼应,陇南各地遂为吴三桂势力所有。清廷特命刑部尚书、陕西经



略莫洛督兵镇压。次年十二月，清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举兵反清，杀莫洛于宁羌（今陕西宁强县）。至此，反清势力大振。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康熙严令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鄂速定陇右。清军以重兵包围秦州。吴三桂派兵由四川、平凉增援秦州。董鄂分兵迎战，吴三桂兵溃败，清总兵孙思克追击吴将巴三刚于礼县等地，清兵收复秦州、礼县。十二月，吴之茂屯兵西和凤凰山，清总兵王进宝率师驻西峪堡。清兵副将田万顷举兵进攻凤凰山。吴部居高临下，炮矢齐发，田万顷战死，清军大败。后清兵采取围困、夜袭等办法进攻吴军。吴军孤立无援，节节败退。次年，吴之茂又汇集重兵与清军在礼县、西和一带作战，迭遭失败。阶州也反复多次被争夺。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一月，驻守阶州的吴三桂总兵陈友功投降，清军收复阶州。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清军大军攻取四川时，两当、徽县、成县、文县等地才相继为清军收复。

清仁宗嘉庆二年（1797年），白莲教蓝号起义军进至陇南山区，准备南下入川。清将恒瑞封锁白水江渡口。起义军遂东渡嘉陵江，进入陕西汉中境内。第二年，又北出凤县，进入两当、徽县、礼县、西和境内，在西和百草山击败当地团丁的阻击，杀死拔贡王元佐及团丁四十余人。嘉庆四年（1799年）二月，进至阶州柳林里（今武都区马街乡），绕城而过，到达两水，沿河而上，至西固两河口后，又返回两水，派马队百余骑绕阶州城侦察，烧北堤西禅佛寺，遂顺原路返

回礼县。同年五月，白莲教起义军进至阶州白马关（今康县云台镇），同陕甘总督恒瑞激战多日。清军广厚、吉兰泰率军自贾家店、黑马关抄起义军后路。起义军被迫退回西和、礼县，后又转至阶州宋川河（今武都县安化镇）。清将富成领兵追至宋川，起义军迎战不胜，南入佛堂山，越毕家岭山，进入鱼峡沟，沟深不得出，为清军所败。七月，起义军一部退至文县，攻狼卡寨未克，在清军大炮轰击下，损失惨重，死两千多人，余部退入四川龙安（今四川省平武县）。

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白莲教起义军高天德、马学礼部再次攻入文县，由哈南寨进至距城五里之西园。清军堵防于伐子坝。起义军撤退时拥挤落水者甚多。四川提督七十五及阿哈保夹击起义军于摩天岭，克新寨，进围铁楼寨。起义军冒雨突围，弃牲畜、甲仗，分散于山谷间，由甘南卓尼土司地退至岷州、秦州。同年六月，起义军两万余人由陕西略阳进入徽县、两当县境内，陕甘总督长龄率官兵前来堵截。双方在今徽县伏镇架山一带展开激战。起义军先发制人，突袭长龄大营，清兵大败，将军富成、游击台清阿等军官十七人被起义军杀死，士兵战死者一千多人，尸体满山。起义军大获全胜后主动撤回陕西。第二年，起义军苟文明又进入阶州境内，召集起义军余部数千人后，撤离阶州，进入四川广元境内。从嘉庆三年到嘉庆六年，白莲教起义军先后在陇南境内转战达四年之久，作战数十次，杀死清兵数千人，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后在

清廷重兵镇压下，白莲教起义失败了，但秘密的反清活动却没有中止，白莲教组织从此遍及全区各地。

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次规模浩大的农民革命战争。这次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带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于地处嘉陵江上游的陇南地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太平军安庆保卫战失败后，天京失去了屏障，湘军直扑天京。为了挽救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庐州(今安徽亳县东南)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等西进，远征西北，以牵制清军，减轻对天京的压力。自此以后，太平军在转战陕、甘途中多次途经陇南地区，同清军展开殊死斗争。

最早率领太平军进入陇南境内的太平军将领是端王蓝大顺。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七日，蓝大顺所属郭刀刀部在攻占陕西凤县后挥师西进，相继占领马陵关、杨家店，进逼两当城下。两当知县姜熊、典史王道平、游击梁生辉组织守军顽强抵抗。十九日凌晨，郭刀刀率部猛攻，并发巨炮轰击，从北城缺口处攻入两当县城。姜熊自缢而死。王道平、梁生辉被俘后处死。九月二十七日，太平军向徽县进发。次日，从东、北两个方向向徽县县城发起进攻。知县赵必达拼命保城。太平军围城一月，终未能攻克。遂又至成县，因知县严厚培防御严密，也未能克城。起义军撤回，转战陕西略阳。

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蓝大顺部

的另一支起义军在将领赖文光率领下，从陕西省略阳进入两当县太坪场，九月中旬攻克两当县城。与此同时，另一支太平军曹灿章从凤县进入两当，同赖文光部会合，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由两当太阳寺(今两当县太阳乡)直插秦州。另一路分两支西进，一支渡永宁河进逼徽县，占领东关旧城，攻县城不克。另一支从高桥进攻成县县城，亦不克。随后，两军合兵进军西和县。这时，清军大队从天水南下，太平军与之交战，连战数日不胜。最后，于十一月下旬退往陕西境内。与此同时，石达开军一部，也



古河道



自勉县进至白水江,被徽县典吏杨德润阻击,毁船十余艘。太平军始后退,经两当县南乡的小道返回陕西。第二年四月,郭刀刀再次率领起义军进入陇南,先后转战两当、徽县、成县,后进入四川。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初,太平天国启王梁成富与蓝大顺、蔡昌龄合兵两万余人围攻西安不克,遂南走陕西洋县,转战汉中。九月初,攻占陕西略阳。为摆脱清军围攻,休整兵力,他们计划西进徽县、秦州一带。因清军沿嘉陵江重兵布防,起义军感到难以取胜,便乘敌不备,转攻阶州白马关(今康县云台镇),直攻阶州。九月十四日到达佛崖,经甘泉翻山到佛堂沟。十六日到达阶州城下,激战两天,后太平军用地雷炸毁城门,始占领阶州城。知州沈凤才自尽于万寿宫,游击蒋荣苍死于乱军之中。接着,起义军又派兵攻文县。文县知县常毓坤急忙派人去四川求援。四川总督骆秉章急派重兵把守广元、昭化、剑门关,以防太平军入川,并令总兵周达武率兵北上增援。新任甘肃按察使林之望也亲自率兵驻防徽县、成县、西和、礼县、岷县、陇西一带,防止太平军北上与西北回民起义军会合。至十月底,陕、甘、川各路共五十多个清兵营齐集阶州,围攻太平军。太平军固守城池,并在

城郊周围修筑堡垒数十个,分兵把守,与清军反复激战。十一月,一队清军突破太平军北山防御阵地。太平军腹背受敌,仍顽强抵抗。清政府下令四川提督胡中和“稳慎围攻,不必硬拼,而要绝其援应,断其米粮,要使梁、蔡军困死阶州城”。十二月中旬,林之望由天水赶到阶州,亲自督战,强攻太平军军事要地铁宝山。由于力量悬殊,太平军外围阵地全部丢失。清军攻至城下。

同治四年(1865年)元月,太平军开始突围,但遭到清军前后夹击,损失惨重,蔡四、蔡九等二十多名将领被俘。三月底,太平军防守阶州城南龙王庙的将领李国厚率部叛变投敌,太平军势力大减。旧城山、北山相继失守,清兵逼近城墙。六月六日,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军心浮动。清军乘势发起猛攻,他们采用挖地道的办法,将炸药运至城墙底下,将北山城墙炸开数丈宽的缺口。清兵从缺口处蜂拥而入。太平军英勇抵抗,与清兵展开巷战,杀死了大量清兵,终因寡不敌众,太平军全部战死。蔡昌龄在巷战中牺牲,启王梁成富被俘后解往成都,后慷慨就义。至此,太平军远征西北的斗争全部结束。

太平军在陇南转战多年,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陇南的统治,在陇南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说
民
国
硝
烟
滚
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同年11月，陕西革命党人和四川革命党人相继发动革命，直接影响到甘肃。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陇南儿女为响应辛亥革命，也掀起了一系列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在上海、兰州、成都工作或求学的武都籍进步青年樊政、蔡景忱、马占熊及文县学生韩定山、陈蕴章、田国锡等人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同盟会，开展革命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纷纷返回家乡，组织当地群众，联络川北帮会，开展反清斗争。樊政是今武都区城关樊家人，保定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即赴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次，在郑州乘火车南下时被清廷密探跟踪。樊政觉察后跳窗逃走，头部受重伤，幸遇甘肃同乡柴若遇帮助就医，始得脱险。后受孙中山委派，回甘进行革命活动。他携带手枪、炸弹，伪装成棉商潜回兰州，密谋炸总督府，事泄后被拘押于兰州监狱。韩定山是文县城关人，在兰州存古学堂求学时结识了天水学者周希武，接

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即与同学陈蕴章、田国锡等弃学归里，组织“英年社”，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英年社”不久改为“共和会”，民国成立后又改为同盟会文县支部。

1911年11月，在四川南坪“同志会”人员的鼓动下，文县马连乡贡生王汝翼、白马乡贡生雷某、中路乡葛增芳、刘步昌等相互联络，发动群众三千余人，进城捣毁了县厘金局和税局。随后，碧口厘金局和税局也被迫关闭。次年，县知事李润藩为了增加税捐，重新恢复了厘金局和税局。八月下旬，王汝翼等人又带领群众捣毁了厘金局和税局。

1912年1月，阶州知州谭焯借口成立自治局，以编查户口为名，摊派经费，钉一个门牌竟收铜钱10文，社会上又传言收15至20文。消息传出，四乡骚然，城乡广大群众十分不满。于是，城郊何家山的何成海便联络对曲湾的姚永福、大堡里的周天柱、何家崖的何大旗、八海山的王吹相等，聚众数千人向州城进发，要求撤销厘税局，停止征收税捐。腊月初八，起义群众围攻州城。东路何成海、姚永福、何大旗率队占领了东江水泰山庙和北山隆兴寺、三官殿，西路周天柱占领了旧城山文昌宫。起义队伍遥相呼应。知州谭焯十分惊慌，急忙紧闭城门，布置防守，并临时招募青壮年组成“城防勇”，黑夜出城，白日列队返回，变换旗帜，轮番出进，佯作援军，双方相持多日。腊月十二日拂晓，标营武官何尔进乘起义军不备之际，率标兵及“城防勇”数百人，潜出北门，从小山沟爬上



二台子,居高临下,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进攻。起义军没有防备,阵营大乱,数百人被杀。何成海奋勇冲杀,得以逃脱。周天柱急率众沿灰崖子退回大堡里。官府派兵随后赶到,缉拿不到周天柱,就威胁说,如不交出周天柱,就血洗全庄。周天柱得知后慷慨地说:“我作我当,杀我一个,保全大家。”他当晚赶到州城,进城后即被杀害。何成海逃往四川中坝,被侦知后于次年抓回,在县衙门大照壁前被杀害。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在官府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

此后,又发生了多起抗捐斗争。1914年1月,礼县知事任杰派员去吴泉里雷玉山向群众勒逼烟捐,激起民变。秦州总兵马国仁派兵镇压,诱杀了为首者陈雕等八人,民变平息。1915年春,武都禁烟委员丁延年带卫士十余人,赴后迭石里(今武都县洛塘区)查禁烟苗。丁延年乘机大肆搜刮,向种烟户征收“烟苗款”,向不种烟户征收“懒田款”,而且纵兵作恶,奸污妇女,激起民愤。麻柳滩双百杨村民王世清挺身而出,与丁延年论理,一时附近百姓聚集约五百余人。争论之中,群情激奋,一拥而上,将丁延年等十五人打倒并挖坑活埋。事后,王世清即向官府投案自首,被解往兰州。省府自知民愤难平,众怒难犯,恐扩大事态,遂罚银三千两,将王世清监禁年余了事。

1912年2月,河南爆发了由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农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

白朗,河南宝丰人,1912年率众起义后,以“打富济贫”为口号,转战豫南、湖北、安徽等地。袁世凯集中豫、皖、鄂、鲁四省兵力联合“会剿”。白朗为避敌围攻,保存实力,决定西进。1914年4月中旬,白朗军相继攻占乾州、凤翔、固关后入甘;下旬,先后攻占张家川、通渭、陇西、伏羌(今甘谷县),进逼秦州。秦州镇总兵马国仁亲自带马队驰赴三十里铺去迎战,结果一战即溃,他自己也在退往城中的路上被流弹击毙。当晚,白朗军开始攻城,经一昼夜激战,攻占了秦州城。当地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军,更加增强了白朗军的声势。

5月7日,白朗军抵达徽县,“意欲攻取略阳,南窜入蜀”。由于嘉陵江拦阻,川军也赶到略阳一线防堵,白朗军由汉中入川的计划已无法实现,遂改道向成县、武都进军,打算经文县,由碧口入川。5月10日,白朗军攻占成县。19日,西攻武都,占据安化、马街,但清军此时已撤走白龙江上的渡船,白朗军无法渡江,经文县入川的计划也落空了。白朗军只得经马街、两水沿白龙江西进,经宕昌、哈达铺进入地广人稀、少数民族聚居的岷县、临潭地区。5月21日,白朗军抵达岷州城下,城里仅有的几十名营兵惊溃逃散,白朗军占领县城。24日抵达临潭旧城,遇到回军和土司杨积庆藏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一昼夜后,始占领全城。此时,白朗也陷入困境,粮草缺乏,又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援,遂回撤到宕昌。到宕昌后,白朗在马土司衙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各将领意见不

一。一种意见是继续伺机南下,依靠四川地大物博的优势,扩充势力,然后沿长江而下夺取湖北,再图发展;一种意见是东去关中,休整兵马,再回中原。占上风的意见是打回河南老家,积蓄力量,伺机再起。

白朗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决定返回河南。5月29日,白朗军从宕昌出发,经理川、阆井,进入武山。6月6日,再攻秦州城,因官兵早有防备,攻城不利,伤亡较重,白朗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两日后折而南下进入两当,自两当出甘肃境,然后经凤县顺原路向河南撤退。途中因缺乏后援,军队给养困难,又不断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8月,白朗仅率百余人回到河南宝丰,行至虎狼岭被围,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于石庄,起义遂告失败。

白朗军在甘肃活动不足两月,大部分时间转战于陇南境内。起义军所到之处,基本上贯彻了“打富济贫”的方针,受到贫苦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推动了各地农民群众抗税抗捐斗争的普遍开展。

20世纪30年代前后,军阀混战,干戈不休。陇南地处陇蜀要冲,更成为新旧军阀相争之地。州县官员你委我任,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几乎成无政府状态。加之连年天灾,土匪横行,饿殍载道,民不聊生。

1925年秋,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将领刘郁芬等率军进入甘肃。1927年春,派师长倪雨声进军武都。当时,盘踞武都的是从临洮退兵的地方军阀宋有才。宋

军利用武都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与红枪会李红涛相配合,堵截国民革命军。双方在大、小关子一带展开激战。国民革命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相持二十余日,宋军不支,退往陕西汉中,武都遂为国民革命军所占据。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大部开往陕、豫、皖一带,甘肃所留部队不多,陇南更为空虚,川匪白云乘虚而入。白云,四川省平武县白石沟人,原在川军肖绍武手下当排长,后拉枪为匪。白云先进占碧口,后占文县城。国民军牛应宸来攻时,逃往白马河杜家山一带。此后常出没于让水、丹堡、柏元、石坊一带抢劫、绑票、杀人、放火。次年春,牛应宸部奉令东调,白云乘机派其弟白朝义率匪徒百余人到铁楼、丹堡、马泉一带烧杀抢掠,抢走粮食、牲畜、财物无数。凡昌团总张丕文被打死。1930年6月,县长徐建功调民团两次进剿均失利。10月,白云围攻县城,激战两昼夜后,占据文县城。徐建功退守碧口后又受到赵瑞寿攻击,徐建功遂弃官回河北老家。不久,川西汉军统领杨抚权由松潘入文县,收编了白云,并令其攻打武都,被回军击败,退回文县,并同川军发生激战,失败后逃至丹堡、刘家坪一带。1932年,白云投奔驻碧口川军二十九军吕康部。吕康收缴其全部枪械,并将白云遣送回四川中坝,后白云被红四方面军击毙。

就在川匪白云祸患文县、碧口一带的同时,陕西惯匪王佑帮又窜扰武都、西和、礼县一带。王佑帮,陕西吴山县人(一说河南偃师县人),原在陕西地方军



阎党拐子部下任职,后拉出人马独树一帜。1928年春,他乘武都空虚之际,勾结甘匪王长胜突袭武都,未发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县城。县长张佐澍只身逃走,后被省府以“放弃城池,携印潜逃”罪,枪毙于兰州。

王佑帮占据武都后,自任司令,封冯虎臣为旅长,王长胜为骑兵团长,夏老三、段老八、毛老九等小股土匪头子都被封为营长,号称三千之众,并委任王绍武为武都县长。这些土匪无恶不作,抢劫财物、绑掠商旅、吊打百姓、奸淫妇女,城乡人民四处逃奔。当时,吉鸿昌镇守天水,得悉武都百姓遭受匪军蹂躏的消息后,亲率全师官兵赶往武都,于年底赶到武都城下。王佑帮据守没水山、旧城山一带,吉鸿昌用兵如神,从马街爬山,占领凤凰山,集中迫击炮十余门,猛轰王匪阵地,并派步兵两营沿北峪河出磨峪沟。王匪见状,慌忙沿白龙江西逃,其余股匪,也各自奔命。吉鸿昌军跟踪追击,直追到沙湾、清水子一带,王匪仅余十余骑,沿尕儿河坝逃入四川松潘。

吉鸿昌所部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在追击残匪时,露宿于冰天雪地,不少士兵冻掉了手指脚趾,武都人民深受感动。部队进城后,吉鸿昌下令:“不准惊扰百姓,不准私入民房。”当时已是深夜,部队全部露营于北峪河坝。次日,贴出布告:“凡行止无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滋事生非、造谣惑众者,立即改过自新,弃邪归正,安分守己,如敢妄动,拿办不怠。”还规定:“不准私入民宅;不

准调戏妇女;不准拿民间一草一木;不准破坏学校、古迹;不准抬高市价;不准私藏军火;不准窝藏匪类;不准聚众行凶。军民人等,一体遵行,违者军法从事,决不姑息。”并枪决了为匪张目、助匪害民的县长于镜湖,监押了恣意征敛、贪污公款的白马关财政局长宗国均。这些措施使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久受匪患、亟待生息的武都,一时出现了升平气象。

1929年夏,吉鸿昌回防天水,张维玺部王丕襄团驻防陇南。中秋节后不久,王佑帮旧部王长胜、张明柱等纠集大小股匪五千余人,围攻武都县城。王丕襄镇定自若,设伏突袭,打得王匪人仰马翻。生俘37人,立斩于北峪河坝。其余匪徒或被击毙,或跳河淹死,或四散奔逃,此战大获全胜。

王佑帮逃往四川后,投靠了邓锡候,被任命为成都卫戍司令。适逢鲁大昌到成都购置军火。经人介绍,王、鲁二人结为拜把兄弟,共议回甘发展势力。于是,鲁大昌返回洮岷。王佑帮则回成县,收集旧部,壮大力量。不久,王佑帮被占据天水的马廷贤任为陇南后方司令,在成县城内设立司令部。

1930年夏,马廷贤派边防司令马忠、旅长马如龙(尕旅长)进攻武都。县长刘鑫逃往文县。援军四川“江防军”也在汉王一带被马军击溃。武都城为马忠占据。不几日,马忠返回天水,王佑帮赴武都接防。同年秋,川军联合白云攻武都,王佑帮逃回成县,所部被马忠缴械,王佑帮只身逃奔鲁大昌,又被派为武都

城防司令,再次盘踞武都。

1932年冬,鲁大昌第一旅第二团团长何处,带领全团从陇西赶至武都,计划到碧口驻防。王佑帮大摆筵席,为何处接风洗尘。酒后,王佑帮返回公馆。何处随即派兵包围了王佑帮司令部,缴了警卫连的全部枪支,同时袭击了王公馆,捕获了王佑帮。第二天晚上,王佑帮被枪毙于南河堤水神庙前,尸体抛入白龙江,后被赵户坝农民捞起,由其妾收殓。鲁大昌闻讯后派人将其灵柩运至岷县,葬于二郎山。作恶多端的王佑帮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就在王佑帮一伙作恶武都、成县的同时,在礼县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有七千多人被杀。因礼县古称兰仓,此次事件又称“兰仓惨案”。

1930年春夏之交,正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甘肃是冯、阎联军的大后方。蒋介石为了削弱冯、阎的力量,花重金收买了盘踞临夏的马廷贤、马廷贤兄弟,并委任马廷贤为“讨逆军十五路总指挥”,命令他们扰乱西北军的后方。于是,马廷贤乘机扩充势力,抢占地盘,先后攻陷了武威、永昌、民勤、卓尼等地,1930年5月又攻陷了天水。天水被占后,陇南十三县不战而降。礼县县长马绍棠被委任为第二旅旅长。不久,马廷贤通知马绍棠去秦安任职。马绍棠疑虑重重,认为是“调虎离山”,便筹集粮草,扩充民团,整修城防,准备武力抗拒,并四处求援。作好准备后,马绍棠即将新派来的县长安澜拘押入狱。

马廷贤闻讯大怒,派韩进录、王占林率兵六千直奔礼县。农历六月十七日开始围城,并猛攻四面城门。马绍棠则据城固守,双方对峙二十余日,马绍棠粮尽弹绝,外援无望,派人谈判。韩进录、王占林一面谈判,一面请煤矿技工准备炸城。闰六月十日,马廷贤军队挖地道至东北城墙下,遂用炸药炸倒城墙,人马蜂拥而入。马绍棠督军死战,终不能敌,遂四散逃走。韩、王军如狼似虎,不分老幼,逢人便杀。屠杀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城内八千余人,死亡七千二百多,死尸遍地,血流成河。马绍棠被俘,押解到天水后被杀。

礼县屠城,震惊全国。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于1931年1月派严尔艾赴天水调查。严尔艾在水天收受马廷贤巨额贿赂后,不顾事实真相,竟给蒋介石汇报:“马廷贤军纪严明,绝无屠杀不法情事。”马廷贤反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陇南绥靖指挥”。消息发表后,社会各界反应十分强烈。陇南旅兰人士集会游行通电反对,要求惩办祸首,监察院也声言要弹劾严尔艾。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重新处理屠城事件。这年9月,他一面派川军师长黄隐率军进剿马廷贤,一面密示马廷贤躲避风头。马廷贤遂携带金银珠宝秘密逃往南京隐居。至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1933年2月,礼县赈济分会主席刘继贤收集掩埋遇难人员遗骨,得到广泛响应,共筹资白洋1400元,在城北山麓掘一深坑,把收集到的遗骨重新安葬。



其上建17级砖塔,称为“寄骨塔”。塔高3丈6尺,围7丈8尺,缀以对联,嵌以碑记,议定每年六月初十为悼念日。该塔后在“文革”中被拆毁。

红军足迹 遍陇南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先后经过陇南,足迹遍及全市九县(区)一百多个村镇,发动群众,建立了一百二十多个苏维埃政权和多支地方武装。党中央在哈达铺作出了进军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策。红二、四方面军在这里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数百名红军将士长眠于此。红军建立的丰功伟绩,陇南人民世代铭刻在心。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粉碎敌人“川陕会剿”,实施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挥师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进军。全军渡江后,部队分为两路,西路以九军为主力,迅速向梓潼、江油、彰明进军,逼近成都。北路以三十一军、三十军为主力,攻占青川、平武,直抵川甘边界。4月10日,北路红军抽出部分兵力,分三路攻入文县境内。其中两路分别进占平台山、黄土梁、李子坝,进而攻取战略要地悬马关,直逼陇南重镇碧口;剩下一路直插摩天岭,击溃守敌后向文县县城挺进。计划攻取文县,

进而夺取武都、天水等地,实现在陕南、陇南、川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驻防昭化、碧口、文县县城一带的敌军是胡宗南任师长的国民党第一师独立旅,旅长是丁德隆。面临红军的猛烈攻击,他一面布置防御,调集军队、民团拼命抵抗,一面等待援兵。坐镇天水的胡宗南急忙亲自率领十二个团的兵力日夜兼程赶来增援,在摩天岭、平台山一带同红军展开争夺战。战斗异常激烈。攻占摩天岭的红军部队曾一度进至刘家坪附近的梨树台、马尿水一带,在这里同前来堵截的丁德隆旅第二团相遇,双方发生激战。胡宗南闻知红军进逼县城,急调六个团的兵力前来增援,并电令驻守松潘的四十九师从西面向红军侧击。此时,红军腹背受敌,后续部队也没有跟上,为避免孤军深入,遂主动撤回摩天岭固守。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又接受了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主力继续向川西进军。于是,这支红军部队在摩天岭一带同敌人激战了十九天之后,于4月28日主动撤离战斗,退回青川、平武境内,随大部队西进。

1935年7月底,红二十五军长征部队三千多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先后经陕西子午镇、周至、佛坪、留坝,到达凤县双石铺。在双石铺,他们获得了胡宗南部署军队堵截中央红军的情报,遂决定攻击天水,以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北进。8月2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双石铺,翻越马陵关进入两当境内,至灵官殿,部

队占领了祖师山、北崖沟、王坪沟一带，分三路包围了两当县城。此时，国民党县长朱志和以及部分保安队和警察早已闻风逃出城外，只有保安队副大队长乔玉良带领二十多名保安队员占据城西碉堡进行顽抗。

8月3日清晨，红军发起进攻，一支部队在正面佯攻，以吸引敌人火力。另一支部队从刘家沟绕到西山山顶，突袭敌人碉堡，经过激战，攻占碉堡，生俘敌人二十多名。战斗中，有七名红军战士牺牲。

红军进入县城，张贴了安民告示，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无辜关押的群众，枪决了反动军官乔玉良、朱玉川及土豪劣绅罗朝礼。第二天清晨，红军离开两当继续北上，上午10时左右到达太阳寺（今两当县太阳乡）。在这里，抓获并处决了躲藏在村里的县司法庭长丁纬和五区区长张恭生。傍晚到达前川村。次日，红军离开前川村进入天水县境。

1935年9月17日拂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二师四团在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追击逃敌进入岷县境内。守敌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仓惶向县城方向逃窜。傍晚，敌后卫部队逃至大草滩，被红军追上歼灭。红四团占领大草滩后，直逼岷县县城。次日，红四团又奉命南进，占领了哈达铺。

在红四团追歼残敌的同时，毛泽东率红军主力也通过了腊子口，顺朱立沟过打拉山，于17日下午到达旋窝村。20日清晨，从鹿园里出发，经分水岭、阿坞

河，下午到达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住在镇上“义和昌”药店后院的平房里。司令部设在离毛泽东住地五十多米远的“同善社”。哈达铺繁荣富庶，物资充足，物价便宜。为了恢复红军将士的体力，党中央决定在哈达铺进行休整。总政治部还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

在哈达铺休整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从邮局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获得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消息，遂放弃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向陕北进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发,会师陕北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22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当日下午,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强调了到陕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会议结束后,部队立即进行了传达讨论,开展了遵守群众纪律、坚持党的政策的教育活动。一军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还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迅速北进,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军,建立根据地。”时任红四团团长的杨成武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曾写道:“哈达铺东西十分便宜。一只百来斤重的肥猪,五块大洋就够了。一只肥羊,才要两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蔬菜也是几毛钱一担。加上鲁大昌部队逃跑时丢下的大

米、白面数百担,食盐数千斤,足够我们大大改善生活了。”并深情地说:“哈达铺是我们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这批老红军战士对哈达铺印象十分深刻。1978年,肖华同志来到哈达铺,也写下了“红军越岷山,哈达大整编。万里云和月,精兵存六千。导师指陕北,军行道花妍。革命靠路线,红星飞满天”的诗句。

向陕北进军的方针确定后,党中央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下辖三个纵队,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分别改编为一、二、三纵队,全军共约七千人。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三天后,按照党中央“佯攻天水,北渡渭河”的作战计

划,先头部队于9月23日从哈达铺出发,向东经宕昌理川、八力到达岷县闾井。敌人怕红军进攻天水,威胁西安,慌忙把渭河防线的兵力调往天水。这时,陕甘支队却突然从闾井北进,急行军一昼夜赶到了渭河边的鸳鸯镇。26日,



哈达铺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址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胜利突破了敌人的渭河封锁线，占领了通渭县的榜罗镇。此后，继续北上，经通渭、静宁，翻越六盘山。10月18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

1936年7月2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合。8月初，按照党中央“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城”的指示，二、四方面军决定发动“岷(州)洮(州)西(固)战役”。8月9日，红三十军在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突破腊子口，直逼岷县。10日，攻占了岷县城外围据点，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县城。当晚，即向守敌发起攻击。8月18日至23日，红九军、五军也相继进入岷县，一部协助三十军围困岷县城，一部向漳县、渭源方向扩进。四军、三十一军分别攻占临潭、通渭。由于岷县守敌顽强抵抗，县城久围不克，遂又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红四方面军各部于10月9日全部撤离岷、宕地区，向静宁、会宁、通渭、武山地区开进。

在红四方面军进占岷县、临潭地区的同时，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等同志率领下，也于8月23日通过腊子口，经旋

窝、大草滩、麻子川，到达哈达铺。9月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党中央“东出陕甘交界的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一带”的指示，发起了“成徽两康战役”。决定乘陕甘敌人分兵据守之际，兵分左、中、右三路，攻取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和陕西的凤县、略阳县，建立临时根据地。8月29日，左路以六军为主力，在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下，从哈达铺出发，经礼川、八力、间井、马坞，向礼县开进。30日，包围了礼县城，城内守敌拼命顽抗，红军多次发起猛攻均未奏效。此时，敌人从西和派兵增援，红军遂于9月5日撤出战斗，转战固城、崖城、红河，经天水平南、娘娘坝、李子园，进入徽县境内后又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徽县县城，一路进攻两当县城。至18日，两城均被攻克。

中路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于9月11日从哈达铺出发，经八力、间井，礼县



宕昌县哈达铺长征纪念馆毛泽东、张闻天住过的房屋



洮坪,西和姜席、彭寺、梁集、石峡,成县纸坊等村镇,于17日抵达成县城下,当日攻克县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也进驻城内,贺龙住在天主教堂。20日,总指挥部移驻徽县县城,三十二军继续留驻成县,开展群众工作。

右路纵队二军六师在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领下,从宕昌脚力铺出发,东经宕昌、新城子、临江、南阳、韩院、好梯、竹园等地进入礼县。经桥头、草坪、雷坝、肖良等地进入西和县崖湾,然后南下过嘉庆沟,经武都白路窑、包峪寺、隆兴、鱼龙、佛崖和康县望关、长坝、巩集、大堡、寺台等地,于19日攻克康县县城(今康县云台)。21日,主力离开康县城,东经大南峪、窑坪、木瓜园、邓子园进至陕西略阳白水江镇,后撤往徽县。十七团在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带领下继续驻扎云台,开展群众工作。不久,又进

到略阳一带担任警戒任务,后由于与主力失去联络,转战途中损失惨重,最后在康县南部遭到反动地主民团的伏击,弹尽援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红二方面军在成徽地区的胜利,使敌人十分惊慌。9月下旬,胡宗南、毛炳文、王钧各部纠集兵力,分路向成徽地区逼近。9月27日,王钧部三十五混成旅由武都向东追袭红军,在大川坝一带同红三十二军遭遇,敌团长朱冰当场毙命,红军边打边撤,退至五龙山。五龙山位于成县城西十二华里处,西临抛沙河,地形复杂,便于伏击。28日,敌军进至抛沙河,抢占了五龙山对面的牛斜山,与红军对峙。午后,战斗全面打响,敌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强渡抛沙河,向红军阵地猛攻。坚守五龙山阵地的红军六师十八团、四师十二团同三十二军紧密配合,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经过一天多激战,红

军胜利完成了牵制敌军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29日凌晨,部队奉命撤出战斗,经红川到徽县与主力会合,成县县城复被敌人占领。

10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致电党中央,建议撤离成、徽、两、康地区,向北



成县支旗刘伯承、汪荣华结婚的老房子

转移。经中央同意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分左、右两路北进,六军为右路纵队,二军和三十二军为左路纵队,总指挥部随左路纵队行进。4日,六军十六师、十七师离开两当城,在徽县韩家湾与十八师会合北进。次日,十六师在天水娘娘坝遭敌袭击,师长张辉牺牲。后在礼县罗家堡又与敌遭遇,十六师大部牺牲,政委晏福生负重伤。与此同时,左路纵队也撤离徽县。8日,左、右两路纵队在礼县固城会合。9日,离开固城,强渡渭河。22日,到达静宁将台堡,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

红军在途经陇南期间,充分发动和教育群众,建立了一百多个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和农会,建立了十五支地方武装。为了保证红军的休整,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农会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筹办粮物、支援红军的活动。据统计,仅成县、徽县、两当县就为红军筹集粮食七十万斤,白银一万多两,衣物三千多件,使经过雪山草地、艰苦长征二万多里的数万红军将士得到休整和补充,为继续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红军的教育影响下,陇南有五千多名游击队员和群众参加了红军,仅宕昌就有三千多名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军。这些陇南人民的优秀儿女,在革命队伍中南征北战,血染沙场,多数人英勇牺牲,忠骨葬于异乡。一部分被派回家乡开展地下斗争,成为陇南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地主民团立即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和屠杀,全市被杀害的苏维埃和游击



徽县吴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队干部有三十多人。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陇南人民毫不畏惧,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宕昌苏维埃干部牟章娃,被地主民团包围后,仍坚强不屈,与其父手持斧头、长矛同敌人搏斗,直到壮烈牺牲。赵海甲面对恶霸赵旦旦的屠刀,怒斥道:“赵旦旦,要吃张口,要杀开刀,今天你杀了老子,明天会有人提你的头!”

红军的英雄事迹,永远在陇南山区流传。红军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陇南人民奋进。

